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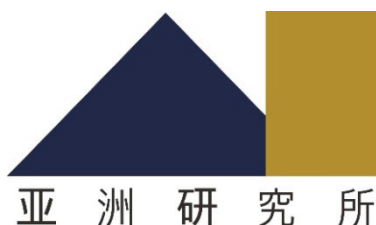
我绝不畏惧邪恶

美国总统大选为何
一定要有真正的独立参选人参与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我绝不畏惧邪恶

美国总统大选为何一定要有真正的独立参选人参与



著者：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出版：亚洲研究所出版社

地址：The Asia Institute, 1730 Rhode Island Avenue, NW,
Suite 414.

Washington, DC 20036

开本：1/32

印张：

字数：81千字

版次：2020年6月第一版

印次：2020年6月第一印刷

印数：500册

书号：ISBN 978-1-64999-453-0

定价：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写给中国读者的几句话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1

我绝不畏惧邪恶——美国总统竞选宣言 5

十七点纲领 9

民主经济 19

迈向民主的一步：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29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39

何为安全？ 49

运用政治合气道来平息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风波 57

全民基本收入：经济自由还是迈向奴隶制的第一步？ 69

病狂状态之下的美国 75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87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103

空前危机下联合国急需根本性转型 107

中美贸易战：远离战争边缘 113

美国应向中国学习，固守科学前沿 117

美国的“文明冲突”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121

脸书归何人所有？ 125

朝鲜战争 133

写给中国读者的几句话

本书涵盖了我自 2020 年 2 月宣布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以来，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发表的一系列演讲。这几篇演讲的目标听众是美国人，我想要为他们指明方向，告诉他们美国可以有怎样的未来，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摆脱危险的消费主义、残酷的剥削压榨和无休无止的战争——它们犹如可怕的病毒侵害着这个国家，且因心怀叵测的寄生虫的推波助澜而愈演愈烈。

这一观点用一句话便可清晰无比地概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度强大”，而我要说，“开辟美国的伟大之路”。

这几篇演讲虽然并非面向中国听众而做，但它们都与中国密切相关：我在演讲中就保证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提出了别样的方案，令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中国并肩前行、紧密合作，但合作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今天的美国而言，拥有秉持这一观念的总统参选人至关重要，因为腐败堕落的民主、共和两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妖魔化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以此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矛盾和制度腐败问题的关注。

极右翼势力事事归咎于中国的做法已经常态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为了从右翼攻击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宣称特朗普的糟糕之处在于对中国的态度太过软弱。一位备受排外反华势力拥戴的总统竟然被民主党人诟病为亲华人士，真是荒唐至极。

2020 年的总统大选有这样一位参选人：不仅能读会写、会讲中文，而且深受中国哲学与文学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的朋友们不应低估他的重要性。我不单主张美国应当同中国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更要强调，我们美国人应当向中国多多学习，不只以今天的中国为榜样，而且要从其丰富的文化中汲取养分。

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威胁，是所谓的“黄祸”，会侵蚀某些优秀的西方文化。恰恰相反，我觉得要用全新的人类社会模式来取代当前危机重重、以消费和增长为中心的文化体制，我们可以在中国三千年以来的文化与哲学积淀中找到答案。在我看来，引入中国文化并不会让美国有受制于中国的危险，反倒能够赋予美国人以再次发掘自身潜力的机会。

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仅限于中国。多年以来，我始终在研究日本、越南和韩国，我相信中、日、越、韩四国完全有就儒、道、释文化传统开展深度对话的空间，而这种对话可以带我们凌驾于几十年来一直主导人们思想的对抗、竞争、贸易协定、军备竞赛等事物之上。

中国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不仅仅想把中国的现行政策介绍给美国。我融汇在演讲中、要告知给美国民众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中方或许也需要经历深刻的文化与制度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根本不像采用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让投资银行受惠来促进经济发展那样简单。如果说我有什么想法，那就是中、美两国都需要拾起中国关于道义经济的传统理念。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论述，是因为我感觉倘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超级大国中国日益强盛，令美国相形见绌，但仍然奉经济增长、消费和技术发展为解决世界经济、精神危机的灵药，实属憾事——当初美国在联合国建立后，几乎全盘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全球经济体系，又在成为经济强国和全球主导力量的诱惑下放弃了践行国际主义、在联合国的大旗下同中国和苏联合作的良机。希望中国不要蹈此覆辙。

中国完全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机会，但成为真正的领袖，意味着勇于发掘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意味着重新审视关于经济增长、关于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观念。这一任务堪为艰巨，但我领导的美国政府会同中国密切合作，同勇敢坚韧的中国人民，同志向相投的日、韩人民合作，摒弃肆虐全球的消费主义，以真正的国际主义为航标，着眼于我们星球的未来。



贝一明在亚洲研究所

我为何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与总统竞选？

我叫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已经宣布自己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参选人。

自1998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教师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任教，但偶尔也在高中教书。我主修东亚学，这门学科涵盖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与文化。近几年来，我的文章开始涉及当代政治、安全、技术与经济问题。

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因此我在早年间就认为，新生代——像我一样的人——完全有必要对亚洲做深入了解，从而得以跟亚洲人民合作交流；他们对我们知之甚深，我们至少也应当做到知己知彼。

我还在日本和韩国工作过，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美国需要怎样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让我能够从外部以更为清晰的视野观察我们的国家。

身为亚洲研究所理事长，我致力于帮助美国人民正确地认识亚洲——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市，是专门就外交、安全与经济问题开展研究、举行讨论的智库型机构。我与一心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最低预算之下履行职责，如何谋求资助与拨款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自从今年一月起，我在华盛顿看到整个联邦政府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不详的阴云笼罩了能够决定我们兴衰成败的众多机构。

当前的政治体系根本无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气候变化，财富过度集中，军备竞赛，技术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一点我也心知肚明。

遍观各位政坛人士——不论是美国总统参选人，还是其他政客，显而易见，他们的政治活动已然沦为毫无实际意义的仪式，他们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更像是无甚用途的咒语。我们已不再同

民众交流，讨论道德、科学乃至未来。

这样的政治文化不但令人不安，而且隐患重重。我甚至早在一月份就看到了联邦政府迈向灭顶之灾的迹象。

我决定宣布参选，是因为哪怕在少数党的参选代表中，视解决当前严酷危机为己任的人也无迹可寻。

我于几个月前起草了自己的竞选宣言，深信我们必须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美国将无药可救；还有，只有独立参选人可以将这个国家引向正途。

大多数好友在得知我的观点之后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倘若不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没有企业财团的大笔献金，无法在各个党派中广结人脉，不要说竞选总统，就连当选议员、甚至地方政府官员都难于登天。

在世人眼中，我的举动无异于哗众取宠。

然而正是他们的话让我更加深切地觉得，在社会日益混乱、国家前途未卜之时，我应当发表自己的宣言，尽己所能来做出改变。这样做不是为了吸引操纵联邦政府的腐败机构的目光，而是要呼吁大家重视宪法的规章与精神。宪法这一核心文件决定了美国何以为美国，也赋予了我参与总统大选的全部权利。

还有，我写完演讲稿之后，同各色各样的人交谈过；他们之中，有贫穷的工人，有教师，也有餐厅员工。我相信自己能够真正地代表这个国家的需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来源的资助，而且自己也深陷失业的窘境。作为千千万万处境艰难美国人中的一员，我可以全心全意地代表他们，而身居高位的政客根本没有付出此种努力的可能。

权贵们在华盛顿筑起了高墙，为的是避免像我一样的人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受邀参与各种活动，避免有人认为我的话值得一听。

然而，残酷的现实非但没有令我灰心丧气，反倒激起了我的万丈雄心。我很清楚，只有彻彻底底的政治变革才能拯救我们，而沉迷于财利荣禄的民主、共和两党难当大任。此外，所谓的“独

立派”也无力发起能够摧枯拉朽的运动。

今天，自称为“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权威人士与政治家们视向肮脏的主流媒体献供为荣，争相为其献祭污秽的贡品。他们言语粗鄙，避重就轻，为讨好权贵而煞费苦心。

媒体赚取的是不义之财。它一方面为企业财团创造利润，一方面让我们闭目塞听，无法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何种变故。

还有的政客认为，媒体手眼通天，可以通过搬弄是非、炮制丑闻决定任何人的成败，因此绝不敢抬头望这位伪神一眼。

如果拥有富豪的支持、被腐败媒体赞不绝口才能参与总统竞选，那么显然我不具备参选资格。

可是，本应被我们视为行动基石的美国宪法并未规定美国总统非富即贵。

反而言之，倘若其他参选人胆敢收取投资银行、跨国公司或超级富豪的献金，那么不配担任总统之人并不是我，而是他们。

我敢断言，诸位如果读过我准备的资料，听过我的演讲——哪怕只有几分钟，一定会对我的满腔赤诚了然于心。

我决心服务于诸位的利益，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反映诸位的洞见。我对“保守”“进步”一类的陈腐言辞毫无兴趣，因为它们本就是用来迷惑、分化我们的词语。请向我直抒胸臆，让我们风雨同舟，为创造美国的全新希望而努力。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2020年2月23日

我绝不畏惧邪恶——美国总统竞选宣言

历史的长河千回百转，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静观其变、顺势应时，更要掀起一场变革，令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刻。我之所以宣布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并非由于艳羡名利，艳羡随着制度恶化而愈发耀眼光鲜的种种特权，而是因为，倘若深受美国优良传统熏陶的人都明哲保身、避而不战，这个国家将难以摆脱血脉枯竭的命运。

此时此刻，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政坛：植根于真相真理，容不得异想天开、心血来潮。道德沦丧，已经令我们深爱的美国化作一片废墟，我们绝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应当惜老怜贫，同时树立起远大的理想，为这个国家绘制蓝图。

我不会做镜花水月般难以成真的承诺。除非让真实之语回归政坛，除非重新建立秉持、践行崇高理念的政府，否则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的政客，他们的许诺都无异于一纸空谈。

如今，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新闻行业，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社群乃至我们的家庭都在深渊的边缘摇摇欲坠。我们自欺欺人，迷失已久，甚至不敢面对铺陈于眼前的废土。

我要争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我们群策群力，在每一片社区中建立起参与型制度，让民众树立理想、塑造良好习惯、制定有建设性的政策，为重建美利坚合众国奠定基础。

倘若我们无法团结一致，只把彼此视作剥削利用的对象，即使开展最深层次上的政策改革，都无力回天。

今天的公民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仅仅是消费者。他们被迫消费的，是经过广告跟媒体公司公共关系公司粉饰包装的白日梦。在美国雇佣这些公司的，正是每一位政客背后的金主。

堕落媒体如此引导我们：身为旁观者，我们别无选择，只能

向政客献金——尽管他们永远不会面见我们、不想代表我们、也不接我们的电话。媒体被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所操纵，为愚化我们煞费苦心。他们希望我们相信，当前的诸多问题只有魔法师才能解决，要对给与们启迪、教我们怎么用双手改造社会的领袖退避三舍。然而通往优秀政府的大道只能由我们自己铺就。

正如美国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博士所说：“欲争取自由，须自己动手。”

我参加竞选，并非为了揭露黑幕。公民不应当依赖于媒体，而要建立自己的新闻系统——媒体宛若散发着恶臭的沼泽，要求我们做它们的奴隶，逼迫我们对它们卑躬屈膝。各家媒体毫无例外，都对我冷眼相待；我倒是欢迎他们的冷眼。

我所期待的，并不仅仅是11月的选票。我还想请大家与我们并肩作战；每一时，每一刻，同我们竭诚合作，改变美国。你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造一道坚固的桥梁，桥对面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倘若我们的社区团体不秉持民主原则，不采取参与型模式，那么它们便无力支撑国家的民主制度。

现在在美国肆意扩张的监狱中关押着无辜之人，学校等等陈旧的基础设施令我们的孩子苦恼连连，对消费、纵欲文化的宣传大行其道，节俭、谦虚等美德却屡遭践踏。这一切表明，危机已迫在眉睫。

国家应当如同精密的钟表，能够有预见性地及时响应民众的需要。然而，倘若表盘上糊满污秽，倘若齿轮破碎断裂，倘若锤杆弯曲变形，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是弃之不理，坐视它越走越慢，最终停摆，无以修复，还是暂时让它停止运行，彻底清理、维修一番，增进其性能？后者可能会招致暴政，然而前者正是暴政之根源。与其袖手旁观，坐以待毙，不如磨砺以须，险中求胜。

追逐极权之人明目张胆地贪赃徇私、强取豪夺，这一现状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因此，让人民的未来有所保障便成为了我们的权利与责任。

在这里，我要提出两条指导今后行动的基本原则：

用科学方法探索真理

所谓民主，即人民的需要与智慧化身为政策的过程。然而，如果人民遭到误导，被歪曲事实、粉饰太平的媒体所蒙蔽，如果他们被驯化，只知寻欢作乐，对国事漫不关心，那么我们便只剩下了无“民”之“主”。倘若政策讨论不立足于真理，那么我们的民主便无异于空中楼阁。然而，棘手的是，真理从不讲求民主。要是通过投票来分辨真假，我们恐怕早已规行矩步地陷入疯魔却不觉有任何不妥之处。

我们要寻根究底，探明美国贫苦阶层的生活状况及其根源所在，查清对外战争为何而打，找出教育与社区系统腐败背后的真相。

同胞们！如果你们挺身而出，开展调查，我们会给予你支持与鼓励，帮助你唤起心中的正气、制定方案解决问题。

建立以民为本的政府

我们的宗旨，借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名言，即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帮助某人当选、推行某项法案来达成。只有在文化与生活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之后，我们才能如愿以偿。

我们不会顾左右而言他，让诸位不再关注百姓创造的财富如何流入嗜血如命、满口谎言的富豪之手。我们要道出真相，绝不畏惧邪恶。唯独如此，我们才能为无休无止的战争画上句点，才能让美国深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摆脱枷锁。

在美国宪法所谱绘的蓝图中，政府代表的是人民，而不是权贵。这个国家的立国之路远非洁净无暇，拥奴、屠杀原住民等罪行让其血泪斑斑。然而宪法留下的火种仍旧在残垣断壁后熊熊燃烧，经久不灭。

如今正是我们重塑政府的时刻。政府不该是由企业出资支持

的公共关系机构，不该是承包商追财逐利的门户。政府是人民福利的保障，是反抗强权之人的靠山。

然而，财富集中、环境灾难、以战谋财等问题甚至未能成为当今知识阶层心中的议题。知识阶层本应一马当先、带领人民，此刻却裹在怯懦与虚伪织就的厚毯中，以模仿“不视、不闻、不言”的三只猴子为荣。

沉默的代价无影无形，却高得可怕。噩梦席卷着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阿富汗荒凉的山间或军队的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阴森的走廊里浸泡于自己的便溺，想要整合支离破碎的思维却无能为力；有的身处私人监狱，只能呆呆地望着空空如也的墙壁。

让我们给为养家糊口而日夜辛劳的人们一丝希望吧！让他们知道，一个把保护他们的利益作为工作重心的政府即将建立；让他们知道，我们绝不会对“奴隶制”讳而不言，绝不会对无休无止的对外战争避而不谈，不会！

真理永不止步

让我们心怀谦卑与柔情、恒忍克制，携手前行。我们不免要与对手针锋相对，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立足、扎根于爱。我们要淘汰贪慕虚华之人，让更多勤勤恳恳的劳动者站上舞台。我们要让世人明白，无形的、健康的意识形态财富恰恰最为珍贵。个人、群体、民族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为了追求真理而随时做好献身的准备——这条堪比明灯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无价之宝。

石油与塑料制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富豪将数以万亿计的财富囤积于海外，互联网已让我们沦为毫无自制力的低等动物……待到我们一起实现伟大转折的那一日，诸多真相也会展现在世人眼前。美国同胞们，请听我一言：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2020年2月23日

十七点纲领

1)我们拒绝承认任何不公正选举

当前的选举制度腐败不堪，毫无意义。合格候选人无法列名于选票，其观念与行动也同其他重要资讯一起被媒体阻隔于公众的视听之外。用于统计选票的计算机系统漏洞百出，为黑客大开方便之门，将人民的神圣选择化作虚有。贫困地区的投票机寥寥无几，父母要在夕阳下排队数个小时，才能撑着瑟瑟发抖的疲惫身躯投出一票。

除非大选接受国际监督，除非每一位公民的投票权都能得到保障，每一场投票的结果都可轻松核查，每一位候选人都能直接向民众宣讲自己的政策，否则我们无法承认任何一场选举的合法性，不论选举对象是总统还是其他官员。整个选举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将商业宣传排除在外。

目前美国的选举并不合法，但我们有抵制其非法过程的道义责任。我并不担心在参与总统大选之后没有富豪给我献金，没有政党支持我。我们知道2020年的大选不过是一场假戏，因此无法接受其结果，更不能认可自诩获胜的“赢家”。更重要的是，“当选”之人很快就会用行动证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代表我们，代表人民。我们只能等待，等待合法性选举举行的那一日，等待像我一样的代表获准参选的那一天。

2)气候变化是目前最为严峻的安全威胁，内政与外交政策应从各个方面予以应对

毫不松懈地履行旨在缓解、适应气候变化的百年计划，应当是美国一切安全、经济与教育政策的中心。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集结全部人力物力，在两到三年内让煤和石油的使用量归零，而非大搞战争经济。

政府将发布指示，要求各界迅速减少矿物燃料的使用、叫停私家车的应用、限制飞机的运用，同时进行投资，支持每一社区安装太阳能与风力发电设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相关技术的知识产权都将由政府接管。我们要立即实现全体建筑的零排放升级，同时在两个月之内令所有住宅的保暖性达到最佳水平。政府将通过利用五十年的贷款令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低于矿物燃料。

我们将停止发放铀、石油与煤炭补贴。这三种燃料将被列为管控物资，不得为营利进行销售。

军队将提前转型，百分之百地全面使用可再生能源，总而由环境最大的敌人变为其最强力的保护者。会造成严重污染的战斗机与旧式航母将立即报废，不论它们可以为企业制造多少利润。因此而失业的人员将获准转入可再生能源领域工作。

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明知矿物燃料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通过向民众倾销这些危险物质而赚得了数亿美元的暴利。根据法律，此举无异于犯罪。因此这些企业及其所有人的财产应当由政府没收，用于实现经济转型。

浪费能源、食物和自然资源的行为将被世人所不齿，不再像现在一样，被当做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大肆宣扬。

政府将对可持续发展城乡社区的建设进行监督，同时退耕还林、退居还野，维持生物多样性。换言之，大批商城、停车场、工厂与高速公路将面临拆除——正是它们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森林与宝贵的湿地。

3)采用必要手段，根除核武器

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因“可用的”小型核装置的推广而愈演愈烈的核战争危机。哪怕经历千辛万苦，我们也要尽力从地球上清除此类危险武器。为后代着想，我们将从美国开始，逐步强行没收、销毁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我们要同国内外、政府内外的有志之士合作，阻止核武器的开发生产。

4) 针对众人不愿面对的往事展开国际性科学调查

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深受否定文化的束缚。倘若维持现状，我们将无从解决气候变化、核战争等问题。我们必须以911事件等2000年大选之后少数人物的行动为调查对象，开展无所顾忌的调查。

国际“真相与和解”团队必须采用科学方法将事实展示在美国与世界民众面前，不对调查深度做任何限制。涉及到重大问题时，全部相关资料都应予以解密。我们要寻根究底，绝不满足于将某一组织推出扛罪了事——就连“东方快车谋杀案”都并非无解之谜。

5) 撤回美国军队，改进联合国工作

美国必须撤回其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军队——它们常常被唯利是图的企业利用，沦为为权贵服务的工具。的确，我们要准备为保护真正的国际安全而战斗牺牲，但只有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安全危机”发生时，才可采取战争手段。与毫无意义地兵戈相向相比，将我们的生命投入到抵抗贪欲、保卫大地、维护纯净海洋、令森林永驻人间的战役中要更有价值得多。

必须将联合国作为针对脆弱地球之未来制定、履行规划的主要组织。然而在此之前，联合国要经过彻底重构，以使其代表地球公民的利益，不受任何企业或富豪的干涉。

6) 企业非人，富豪只能投出一张选票

企业并非自然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富豪以及他们借之以行使意志的投资银行也不应干涉政府决策。政策制定者所需要的信息，应当由终身制公务员、教授等不为利益所动、能够对国家现状进行客观评估的专家提供。

富豪也不过是凡人，不应享有特权，左右政府决策。用金钱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的行为等同于行贿，万万不可将这一罪行美

其名曰“提供咨询服务”或者“游说”。

我们必须赋予行政部门更多权力，让政府摆脱企业的控制，重新恢复独立状态，能够建立严格的监管体制，保护人民。我们有过这样的传统，现在也可以将其重拾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银行、通讯公司和能源公司等众多企业都会被国有化，由将维护人民共同利益视为神圣使命、德才兼备的公务员来管理运营。以德治国的传统古已有之，无需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妆点修饰。

7)经济以民为本，服务于民

没有经济上的平等与对金融系统的严格监管，民主不过是空谈而已。数十年来，一个精英集团乘人不备，通过非法和不道德手段聚敛起巨额财富，并将其贮藏于海外。大多数民众根本无法相信，在政府与工业产业光鲜的门面背后，腐败现象已无处不在。

这一切即将终结。我们要授权给成千上万名来自国税局等机构的专业审计员，让他们在联邦调查局的支持下无所畏惧地对所有政府部门（包括国防部在内）开展全面审计；我们要求对国会以及全部议员，整个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的主要官员进行周密的财务审计。如有必要，哪怕几千人因此而被裁、遭受罚款、入狱，乃至面临更为严厉的惩罚，我们也在所不惜。

一旦政府能够把工作重心放在勤劳诚实的民众身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各个企业与富豪作为审计对象。

请记住，巨富手中肮脏的财富源于非法融资渠道与商业行为。必须将其财产规模加以限制，使其无法利用金钱腐蚀政坛、新闻界与教育系统。金融界将成为高度管制领域，实施监管的，将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组织。地方银行将转型为由民众经营的合作社，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

8)对真正的教育与追求真相的新闻调查活动予以大力支持

倘若民众被优质教育拒之门外，他们便无法针对社会现状开展批判性思考、充分发挥想象力与无穷无尽的潜能，政治系统也

不可能规圆矩方。民众应当自幼学习历史、文学、哲学与科学，以充分了解其所处时代中的复杂问题。

我们将建立一个全新的、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的教育系统。学校基金将与当地的房地产税毫无关联；教师将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人人都是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有所作为的公民。

新闻界是教育领域的延伸。新闻报道不该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花边消息，而应以向民众展示真相、引导民众探寻表象之下的经济与文化问题为己任。很遗憾，如今新闻业已经堕落，报纸、电视和网络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都在用荒诞的影像和俗丽的词句迎合人们最低层级的需要。

民众需要学习如何进行客观思考、如何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合作，可如今他们却要接受撩拨感官、推行盲目消费的垃圾信息的狂轰滥炸。

政府必须对致力于探寻真相、鼓励民众自行思考的地方与国家级独立媒体予以大力支持，令无所畏惧、关注当前重大问题的新闻调查再度成为大有可为的行业。

艺术——不论是绘画、雕塑、设计、戏剧、音乐，还是文学，都应当融入大众的生活。政府要对艺术活动给予支持，因为它们可以让民众燃起信心，表达自我，独立、明确地描绘自己对未来的愿景，摆脱对浮华喧嚣、巧言令色的媒体的依赖。

提高年轻人的艺术素养，可以让他们从大行其道、洗脑力极强的庸俗文化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文化向他们灌输及时行乐的观念，剥夺了他们贡献社会的能力。我们应当为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他们拍摄电影、创办报纸、绘画摄影，让他们能够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体面的收入，从而赋予他们改变社会的信心。我们要用能够救赎灵魂、启人心智的艺术作品替代粗俗下作的商业产品。

9) 终结奴隶制，践行第13条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已对奴隶制明令禁止，然而我们仍有

许多同胞因上当受骗而身负债务，他们在工厂与店铺中辛苦劳作，待遇同奴隶一般无二。还有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被迫无偿劳动，还要为一见挚爱的亲友而支付费用。这罪恶的一幕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要谋利。我们要切实执行第13条修正案，将上述恶行毫无遗漏地一并铲除。

10)贸易必须符合生态理念，真正地自由化

贸易有时会为人们带来些许好处，但现代贸易活动已经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令人类世界危机四伏。贸易活动的背后，是一艘艘由投资银行控制的大型集装箱运货船，它们满载着货物，喷着浓烟漂洋过海，其服务对象既不是商品的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而是极少数富豪。

令地方性工业与农业产业毁于“贸易活动”，令民众被迫对进口商品依赖至深，这绝非积极现象，更非全球化的真正宗旨。

我们必须共同全面反思“贸易”之内涵，建立完全不使用矿物燃料、面向大众、尊重地方社群需要的贸易体系。

11)当前政治危机的核心问题是道德滑坡

归根结底，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精神层面的危机。我们深深堕落，陷入自恋，无法解脱，即使心怀善意的人也受到了沾染。

“谦虚”“节俭”“正直”等词汇已经从我们的话语中消失；价值观、品性等心灵要素也已被“人不过是俗物的被动消费者”这一观念而亵渎。

我们必须按行自抑——要结成追求公平正义的群体，唯有此法，必须信任自己的邻居、与子女开诚布公地交谈、坚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则便无法与将这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势力相抗衡。

道德堕落意味着许多满口“自由”“正义”的人在满心欢喜地收取了封口费后对事实真相三缄其口。这种局面必须结束。

12)推进军事情报机构转型

军队失控，令军火企业得以在不必经过任何外部审核与科学检测的情况下，通过销售天价武器将我们的税款直接转入其银行账户。

我们需要愿意为国捐躯的人，然而他/她们高尚的情操却被引入歧途。军队以及与其紧密联系、“身份”不明的各个情报机构必须转型，致力于缓解、适应气候变化，解决真正的安全问题。

我们应当引导军人将勇气与斗志投入到以下危险使命中去：结束矿物燃料大亨及其拥趸对我们国家的统治，实现经济转型。战士们！倘若你们无法挺身而出，抵抗各位能源暴君，那么你们的勇气何在？

我们置乔治·华盛顿提防“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因他国意志遭到破坏的警告于不顾，以所谓的“情报共享”和“安全合作”为名义，签署下无数秘密协定，令灾难迫在眉睫，发生在1914年的那一幕似乎即将重演：当时，一系列秘密协议引发了可怕的多米诺效应，将世界拖入到毁灭性的战争之中。

拿着低薪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朋友们，读着无穷无尽的电子邮件，需要应无良公司的要求、愚弄百姓的朋友们，请听我说，听我发自内心的呐喊：“请于与我们同行！你们能够失去的，只有锁链。”

13)阻断技术对公民的危险影响

主流媒体表示，科技的指数级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频繁接触新技术会使我们丧失集中精神、自主思考的能力，削弱我们的公民意识，令我们麻木不仁。如今技术已逐渐成为用于引诱我们对短暂刺激成瘾的媒介。技术产品可以产生利润，但同时它们也会导致公民无法了解当前危机的严重性。

我们想要同他人交流互动，需要能够激励大家竭诚合作的工作，然而现实世界中，电话留言、自动结款机，以及冷冰冰的、用于计算企业利润的超级计算机无处不在。我们发现自己身处数

字沙漠之中，孤立无援。令大众陷于此种境地的并非天意巧合，而是有预谋的罪行。

在应用某种技术之前，我们必须慎重地审视它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技术或许对人类大有裨益，但要以将其用于解决当前的真正危机为前提；我们绝不能沦为它的傀儡。

增进我们对地球、对社会的科学理解才是技术发展的一贯宗旨。我们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自食恶果。正如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所说：“不论是否基于全新的科学研究而开发，技术都属于道德哲学而非科学的分支。”

14) 叫停愚化人民的反智活动

民众正在被煽动反智情绪、妨碍人们对世界展开深入思考的无尽浪潮所裹挟。我们文化中的此类巨变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某种幕后势力翻云覆雨的结果，其目的是令我们浑浑噩噩、俯首帖耳。

我们必须提高美国各个领域的智力参与度，鼓励民众独立思考，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阅读、写作与讨论至关重要，应当大力提倡。公众绝不能依赖某些名人肤浅幼稚的观点行事。

我们不能坐视商业宣传与公共关系公司毒害、愚化民众，不能放任它们为自恋文化煽风点火、为自我崇拜思潮推波助澜。可怕的是，这些企业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一片片寸草不生的文化荒漠占领了每一个电视频道、每一座商场和每一个办公室，铺陈在我们眼前。

广告与公共关系产业必须受到严格管控，令民众接触能够促进智力参与、支持健康社会发展的媒体影像。公民们有权阅读文章、收看直播，了解以科学方式展示于众的社会现实，有权将推崇富豪奢靡生活的节目阻挡于视听之外。

15)重拾易洛魁“七代”原则，终结对增长与消费的迷信

尽管原住民易洛魁宪法对美国宪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很遗憾，我们的开国元勋们还是忽略了其中的重要一点：重视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将易洛魁部族人与其他原住民的优良传统铭记于心。易洛魁部族人认为，一代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举动都会对后世七代人产生影响，因此现在大家应当谨言慎行。这一原则十分科学、合理，与某些现代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有些人认为，海洋、森林和草地无非是属于个人或者企业的商品，人们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对其为所欲为。

我们要将上述“七代”原则纳入宪法修正案中，将其做为全面衡量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本准则。

在评价国家是否繁荣时，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增长”“消费”等欺骗性词语，同时综合考虑国民的健康状况、环境的受损程度，以及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情况。

我们要生存，合作必不可少。倘若一笔笔预算只能加深我们对金钱的依赖程度，那么当前的诸多问题就不能通过制定预算来解决。我们要建立物物交换制度、开展互助活动，让邻里之间能够互通有无，让家庭与社区能够自给自足。

医疗保健系统的资金问题不能靠政府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解决。我们必须让民众有互助能力，掌握足够的医药知识，学会配草药，接受相关培训，这样大家便可以自己治疗常见病，无需向医院付费。

16)建立以人为本的农业体系与健康公平的粮食经济

全球变暖、气温急剧上升，因此未来十年中，食物价格将呈指数级增长，农业也会再次成为决定人类存亡的、重要至极的活动。灾难一触即发，而我们尚未着手准备。

我们必须摒弃现行的、杀鸡取卵式的工业化农业模式，重拾人工耕作传统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应当把土地分配给大批民众，让其建立家庭农场。不必伤感，不必愤懑。土壤与水源均由地球

母亲所赐，绝不是，也不应该是某些企业的财产。

整个分配系统应当受到管控，保证公平公正。比起让少数人通过出口农产品牟取暴利，以无损于土壤和水源的方式产粮种菜要重要得多。美国人必须接受可持续性有机农业，刻不容缓。

17) 宪法中并未提及民主、共和两党

最近这场三幕的弹劾闹剧告诉我们，当前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宪法毫不相关。国家管理系统已死，政坛也沦为了企业说客、投资银行家、媒体权威及其金主大亨喧嚣叫闹的舞台。媒体早已不再秉持职业道义，无异于乌合之众用来攻讦对手的工具。

一切涉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必须按照宪法规定，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在政府办公室内进行。

然而如今，各个政党公然违宪，制定政策的是大型企业，政策讨论也秘不示人。诸位，不要上当。民主党与共和党并未载入宪法，它们也不代表广大美国公民。

政党把握决策权，既不符合宪法规定，更是犯罪行为，必须予以制止。

政党的作用，是令公民得以在当地开展会谈、交换意见。宪法并未赋予民主、共和两党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力。

民主经济

新冠危机并非单纯由病毒所引发。没有任何一种病毒能够在我们的国家掀起如此激烈的动荡与恐慌；没有一种疾病能够搅起如此可怕的纷繁思潮与难以言说的仇恨。

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崩溃：它虚有其表，空空如也；它深受量化宽松政策与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腐蚀，残破不堪；它被股票回购和所谓专家炮制出的金融产品侵害削弱——这些专家据称比诸位更了解诸位的利益何在。简而言之，如今的经济体系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它已经化作一座虚无缥缈的王国，一座充斥着假象谎言、由居住在空中楼阁中的权贵所占据的王国。

这样的“经济”——如果它还能被称作“经济”的话，与我们，与为养育子女而辛苦劳作的人们毫不相干。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脱离我们的控制，变得不可理喻，不再视工薪阶层为子民。

既有的经济体系已然崩溃，我们必须予以重建。

然而，对已经朽烂的旧屋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美联储既无法创造工作岗位，也印制不出洁净的空气和水。实际上，政府只要还是权贵手中的傀儡，就永远无可作为。我们必须切断狡诈的傀儡大师手中的丝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创造自己的经济体制，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体制。

当前推动经济迅速转型的，是恐惧货币。恐惧如同骇人的病毒，肆意蔓延，令其所及之处陷入动乱与绝望；它狰狞凶狠，最擅长点金成石，把一切珍贵之物、善念美德毁灭殆尽。

他们许诺的一千美元的支票，可曾寄到诸位手中？现在邮局是否还能收件寄件？同现在相比，六个月之后，一千美元是否还能买到相同分量的粮食与厕纸？当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投机的投资银行那里不必等待那么久才付款，破坏环境的矿物燃料企业

所造成的恶果也不会在半年之后才显现。

然而我们不必对贪欲唯命是从。作为公民，我们可以把国家经济掌控在自己手中，可以实现经济转型，而这次转型的发起地，既不是参议院委员会舒适的办公室，也不是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银行家经常光顾的高档咖啡厅。

不，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绝不会出资出力，帮助美国从灾难中恢复。这一次，我们无法像2008年一样，在那头大腹便便的蠢猪的指引下发动屠杀，从而得到救赎。

何为“经济”？

何为“经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简单到在新闻中颐指气使地指指点点、就利率与竞争问题大谈特谈、同时在暗中储备积蓄的金融专家根本不屑于屈尊回答。

让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这个人们原本在恐慌中无暇顾及的问题上来。

经济的基础同伪经济科学复杂的方程式没有任何关系——创造这些方程式的初衷，只是让我们对经济问题望而却步。专家认为没有研习过代数学的人无法理解经济问题，这简直荒谬至极。

其实经济的基础十分简单：保证全体人民有健康食品可以吃，有整洁的处所可以居住，有富于意义、能够贡献于社会的工作可以做。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表达与精神探索应当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善待挚爱的亲友、积极参加当地的社群。

众所周知，精神充实、热爱工作、亲友关系和睦之人无需依靠花大钱、住豪宅来获得满足感。然而五十年以来，节俭这一传统美德惨遭践踏排挤，企业堆起的神龛取而代之，供奉其上的是利己主义、贪婪与自恋主义。

如今，引领我们朝败德深渊行进的是超级富豪。关于这一阶层，在此我想同诸位分享一则出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引言：

“我来告诉你富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与你、与我截然不同。

他们早早地拥有财富、享受人生，因此我们能够刚强度日，他们却柔弱不堪；我们深信不疑之时，他们却满腹狐疑——这种心态，除非你生在富贵之家，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比我们强，因为我们要求生，要为自己寻得补偿和庇护。”

他们推销给我们的“经济”，主要由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与投资银行在世界各地抛撒金钱的行为所构成。而运营各家嗜血银行的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冷酷无情、在计算利润时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二十位的超级计算机。

正是这种虚假的经济催生出浅薄堕落的消费观；它要求我们购买、浪费食物，逼迫我们驾车上班，诱惑我们观看色情作品，怂恿我们通过购买没有用途的化妆品和服饰来取乐、来彰显实力。这种只注重表象的“经济”由公共关系公司和广告商一手炮制，他们的目的，就是催促我们掏钱购物。

消费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然而无人可以针对这个虚假的偶像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浪费东西，浪费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所缴纳的税款，有一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消费类企业、用于策动人们消费，环境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这个过程没有带来多少幸福感，却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体验，碾碎了我们的灵性，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令生活沦为了追求浮华的简单活动。

经济增长是消费的连体双胞胎，增长的高低恰恰代表着我们破坏的多寡。倘若目睹物种灭绝、海洋变暖、同胞受贫等惨剧，我们就会明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然而为了谋求一时的财富，无人光顾的摩天大厦和超级商城依然在拔地而起，塑料与肉类仍然在多此一举地跨洋运送。

倘若我们以“增长”、“消费”一类的术语来定义经济，倘若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只能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实现，那就意味着诸位对家人的爱、诸位为更好的世界而付出的努力、诸位过节俭生活的决心，以及诸位对父母留下的传统的珍视毫无价值——诸位应该把用过的一应旧物丢弃，随后前往商城购买崭新的时

尚商品。

请大家注意，潜伏在这种虚假经济背后的罪恶不止于此。我们将印有图案的纸张紧紧握在手中，称之为“钱”；我们了解到金钱具有价值，我们可以在商店用它交换食物、电脑、割草机，等等。然而钱的价值从何而来？这样的交换因何得以实现？为何我们如此之多的人对支付薪水的公司企业，而非身旁的同胞依赖至深？

早年间，货币以黄金为支撑，人们拿到钱后，可以用它来交换黄金。但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金本位。

现在，钱的价值并非源于人与社群之间的合约与协议。制造钱币的，是美联储——一个身份不明、不受监管、由私人银行运营、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组织。

我们的薪水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银行是在邪恶的金融黑箱之内凭空造钱，至于我们的生活是否遭到破坏，他们漠不关心。其实，见到民众依赖他们才能过活，这些人欣喜若狂。我们生怕丢掉工作，因此根本无暇质疑他们印制的数万亿美元的流向——在最近的金融危机过后，这笔钱被装进了投机者的腰包。

他们施“法”造钱，推开了通往恶性通货膨胀的大门。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一块面包的价格就可能会在短期内从三美元涨到十美元乃至一百、一千美元。这样的悲剧早有先例。

媒体满口谎言，对真相避而不谈，然而征兆就在我们眼前。回望十年之前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如今的食物通胀已经远远高于当时。这一切根本无需哈佛的教授来揭示。

现在钱没有依附在任何实物之上，决定其价值的，是印象，是情绪，是文化，是民众对美国的信任以及对世界体系、对美国在世界体系中霸主地位的信心。这种心态一旦动摇，我们手中钱币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

已有多种迹象表明，民众对美国、对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秩序的信心正在崩塌。

银行家们想要在印钱的同时令美元不至贬值，从中渔利，因

此施展了两个花招：

首先，他们怂恿国家动用武力，同时在民众中煽动军国主义。由此一来，他们通过贩卖武器、推动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借助已然成为金钱黑洞的五角大楼赚得了数万亿美元。四处动武的美国似乎实力超群，所以即使并无实物支撑，美元的价值也能一路飙升。

然而银行家们尚未满足，还将美元与石油捆绑，为确保石油以美元出售、各大石油生产商使用美元交易而不遗余力。这种强行通过促进石油销售来为货币创造价值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犯罪。石油正在影响我们的气候，将我们的子孙后代推向惨淡的未来。尽管如此，很遗憾，石油还是决定着经济的方方面面，逼迫人们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逼迫人们驾驶汽车，逼迫人们使用矿物燃料产生的电力。

各大企业收买了专家，欺骗民众说环境遭到污染、人们每天都要开几小时车再自然不过。美国的年轻人在对外战争中抛洒着热血，保证乌黑的石油能够源源不断地变为钱财。

近来油价的暴跌令我们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一览无余，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国内经济大幅下行。民众不得不依赖于石油，表明普通百姓正在遭受各种势力之间暗战的摧残。大批美国民众已经被迫将自己的生活同石油经济挂钩——他们之中有的在铺设高速公路，有的在炼油厂中炼油，有的在加油站工作，有的在维修店修车。

民有、民享、民治的经济体制

我们的经济体制并未崩溃，只是从根本上遭到了扭曲，因此仅仅服务于一小撮富人的利益。所谓的经济学家表示，面对当下，我们只能提升或降低利率，要么印钱，大量印钱——我们要是听从这些愚蠢至极的建议，最终只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经济制度必须民主化，必须具有参与性。全体民众都应通过正当媒体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了解真正的经济为何物，应当接受必

要的教育，明白经济如何运行。我们要为他们开辟渠道，让他们能够创造价值、提供对社会有益的商品与服务，能够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同他人交换或者交易商品与服务。

但是上述经济活动大多是通过沃尔玛等大型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企业为其所有者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付给员工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工人根本没有机会就超市、餐馆、便利店或其他商业设施的运营方式表达意见。

我们或许在沃尔玛等公司辛勤劳作一生也得不到一丁点股份，享受不到一点点所有权。上司对我们的观点充耳不闻——其实他们希望我们只会乖乖干活，满脑子都是吃喝，只知道看愚蠢浅薄的视频、读时尚杂志。这绝非偶然。

这些企业老板们的财富并非源于他们的天赋与创意。几十年来，大企业从银行获得巨额低息贷款，而为他们做担保的，正是你我。他们利用这笔钱将弱势竞争者残酷地排挤出局，其中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父母经营的小店。毋庸讳言，如果大型零售连锁店没有这一笔笔低息贷款，效率低下、浪费与腐败问题严重的它们根本无力同健康的地方民间经济实体竞争。

请记住，这些银行视民主为无物，从不讲求透明公开。它们自行凭空印制钱币，其结果是我们手中的钱大大贬值。

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让它在避免破坏生态环境与精神心境的同时带给我们大量财富。我们可以修建能够屹立五百年的房屋，可以使用一百年不坏的家具，穿三十年不破的衣服，可以同邻居分享工具与技能，以此来削减支出，增进健康。我们没有必要开展毁灭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让人工智能来驯化我们。

倘若我们有民主的经济体制，诸位即可同沃尔玛一样，享有低息贷款等诸多权利。届时如果有人想使用太阳能电池板、风车等设备来自行发电、拯救我们的地球，同时摆脱虎视眈眈的石油公司的控制，那么银行将会向他提供一笔偿还期长达五十年的低息贷款——届时普通民众也可拥有银行的股份。这样可以使利用

风能与太阳能的成本比使用危险的矿物燃料更加低廉；而现在，银行恨不得逼大家直接吃煤炭、喝石油。

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广告公司来给我们洗脑，怂恿我们自私、自恋、进行盲目消费。广告这一危险的行业破坏了家庭的亲睦，疏远了邻里。

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正在处于无业状态。我们宅坐家中，无计可施。在制度的影响下，如今我们甚至比以往更加依赖这个腐败的政府。一夜之间，我们竟然需要靠别人的接济施舍来果腹度日。

现在，奴隶经济距我们仅有咫尺之遥。或许许多人会觉得我的话过于刺耳，想把我的肺腑之言贬斥为阴谋论者的胡说八道。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确无路可走，面临着绝境。

我们何去何从？

要创造民主、富于参与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需要迈出关键的两步。

首先，我们要自发地在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村镇，村民均是我们社群的成员。我们要跨越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为大家的共同利益通力合作。这些社群将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念、拟定自己的行动纲领，绝不允许跨国银行和企业插手干涉。最后，我们会创办自己的独立银行与公司。在起始阶段，先让社群成员同彼此签订协议，同时召开一系列会议，让我们一一不拿高薪的“政坛人士”——开始商讨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然后，我们要在政府与民间建立各种地方、国家与国际机构，保护民众的努力成果免受权贵的破坏。政府必须转型，拥有管控富豪巨额财产的能力，保证国家决策过程永远不会遭到外包出售。

我们万万不可幼稚大意。政府可以用来唤回民主与公正，也很容易被人为达成邪恶的目的所操纵。而且如果要在腐败的体制之下实行变革，甚至一点点改进性措施，哪怕是最为勇敢刚毅的改革家也会要么一败涂地，要么被关进镀金的笼子。

如若没有齐心协力、了解实情的地方民众的大力支持，我们绝对无法执行国家与国际政策。而大家同心同德不是为了赢得哪一场大选，而是要为营造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开展日日不懈的斗争。

我们鼓励大众积极参与、讲求民主的群体会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一个公允透明、重视道德的经济体系。

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指望得到中央政府或权威人士的认可与支持。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当、光明磊落、刚正负责，那么所谓的“政府”就会向我们虚心请教，寻求启迪。要改变我们国家，这种做法远比选出一群变戏法的小丑要高明得多。

现在的美国与六十年前迥然不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仅凭当地的资源生产食物、制造家具与工具。一场场令人憎恶的仪式从我们这里剥夺的一切都被献给了黑暗之神——技术与全球化。我们不断购买并非必需品的物件，因为媒体鼓动我们与周围的人攀比，要比他们更时尚、更前卫。

我们绝不认可银行、亿万富翁和“精英玩家”有凭空造钱、为亲友挥金如土的权利。

这一次，我们不会给这群罪犯保释的机会。不，我们的政权要全盘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废除他们和他们在美联储的伙伴印制的所有假币。没错，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们要创造一种公民共享型的经济模式。我们要同左邻右舍、全国同胞，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精诚合作，一起开创、发展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

诸位，你们比所谓的精英银行家们更加懂得何为健康经济与公众社群的必需之物——他们不过是妄图通过期货和外汇谋利的投机分子。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一旦诸位获得权力，你们就会真切地感觉自己应当帮助子女四邻，感觉自己对他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倘若你们吃的食物、你们使用的工具产生了某种利润，那么它也理应用回到你们、你们的子女、你们的邻居，而不是投机家的身

上。

至于新冠疫情，它已经成为了权贵们攫取暴利的富矿。众多美国普通民众无法外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首次面临受饥而死的危险，而顶级富豪的财富却猛增了2,800亿美元。

但是，银行家先生们，请不要误会！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通过这次疫情赚得盆满钵满，肯定恨不得下一场瘟疫早一些降临人间。你们想要大批量生产疫苗，但你们要对付的是病毒，绝不是寄生虫。

最后，我还想就这次选举再说几句话。昨天，一位挚友问我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她说独立参选人，尤其是不受权贵、说客和顾问们欢迎的独立参选人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参选所需的资金。

我是这样回答的：

“那天我有所顿悟。我发现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理。尽管人们可能要为寻求真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真理完全是免费的。不仅如此，‘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感谢诸位拨冗聆听。

2020年4月28日

美国的民主主义太了不起了！
给国民这么多的选择。

与俄国
开战！

与中国
开战！



迈向民主的一步：

为何举行特殊选举具有绝对必要性

政坛人士在对我们的国家啧啧称道时，往往会提到其民主制度，可以免俗的人寥寥无几。尽管美国的民主已经蜷伏在他们的脚下流血不止，但他们仍然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其赞不绝口，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美国的民主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当然，它经历过鼓舞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时刻，同时其遭遇过的风波挫折也不在少数。还有，过去许多造访美国的人都可以学习我们的经验，回去以后造福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的作用不可或缺。

往事已矣。如今，美国必须做最为谦逊的学生，积极向其他国家、向全世界深谋远虑的人们求教，深入了解民主应当为何物、可以达到何种境界。

现在，民主在美国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自美国宪法起草时起，我们民主过程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受限。构成限制的，有选举团制度，有投票条件，还有削弱了民众参与度和决策权的各种机制。

以前，有些民众曾经因为身为黑人或者原住民，因为身为女性，因为无力承担税款，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力。而在当下，仍有许多人被拒于投票的大门之外，是由于他们有犯罪记录（常常是被迫签订认罪协议留下的恶果），由于他们的身份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甚至仅仅由于当局在统计选票时出现了疏漏。

投票的门槛越来越高，十一月的大选已经丧失了选举的全部意义。

关于民主，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大多数备受我们推崇的政治家都不会触及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质问，倘若我们的社

群成员彼此互不相识，倘若他们无法参与自己所在社区、城市、州府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们是否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倘若政府在没有同民众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便大举铺设公路，修建学校、办公楼等设施，破坏环境，这样的做法是否民主？我们怎么能把决定权交给银行、开发商和企业财团，置民众的意见于不顾？

的确，我们有时会按照要求，抽空去给某一地方、某一州或某一国家职位的预选代表投票。但是，如果所有政策都由对投资银行和超级富豪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决定，我们是否投票又有何不同？

倘若我们无法参与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众多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是否拥有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身为意见领袖的舆论制造者都通过主流媒体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选举过程和国家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不该因其而否认大选的合法性，不该质疑体制本身。

此举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民主体制被进一步瓦解，公民投票受到阻碍、投票机无法进入社区、权贵阶层在初选和普选中操纵选票等问题愈演愈烈。

有人认为，有公民因其社会经济地位或族裔背景而被剥夺了投票权绝非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将犯罪者以重罪起诉并关进监狱的依据。还有人认为，投票机上的软件可以被轻易篡改、无法留下可以追溯的选票来源根本无关大局。

用于统计选票的技术漏洞百出，谁都不会将其应用于自动取款机或者其他货币管理系统。这是因为对于现行制度而言，至关重要是钱，而不是公民的选票。

身在美国的我们所缺少的，是要求叫停虚假选举，宣布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绝不承认此种选举合法性的政坛人士。

就让我来说出别人怯于说出，却又不可不说的话吧。2020年，共和、民主两党举办的一系列初选根本不是民主选举。定于2020年11月3日开幕的众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大选不论怎样说都

不可能是合法的选举活动。

我们无法接受这种所谓的“选举”，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证美国拥有正规的选举框架、令其民主传统重新焕发光辉。大选应当突破当前桎梏，使全部民众都有机会以得到充分验证的方式投出选票，确保身份证法等各种邪恶政策不会用于剥夺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必须重建美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我们需要重拾2000年计票程序私有化之前相对透明的选票统计框架。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美国上下开创真正透明负责的选举过程，为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打开大门。要让公正公开的投票活动得以在贫民区、原住民保留地和被权力掮客弃之不理的偏远乡镇开展。

我们必须举办合理合法的特殊普选。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政党所扮演的角色

举办特殊选举意味着美国的前进方向会发生重大变化。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此举将开启鼓励民众参与、提高政策透明度、遏制营销与消费对大众的控制、阻止少数人掌控政府的良性循环。因此铺好地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选的许多准备工作都要求我们重拾宪法精神、参考宪法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以民主、共和两党为首的腐败政党在此次大选中兴风作浪。宪法并未赋予他们任何特权来管理政府；他们与财团、与权贵勾结，铲除异己，标榜自己为民众仅有的选择，这种做法不仅不合道德，而且违法违宪。当然，打着他们旗号的组织可以自由地与民众接触、讨论，但不应当比其他公民团体更受重视。尽管参选人可以隶属于任何党派——包括上述政党，但就选举本身而言，重中之重并非哪一政党执政，而应当是执政党要采取何种政策、将做出何种成绩、会针对当前问题制定怎样的长久之计。

科学与观点

大选之前的所有相关讨论都必须立足于科学分析。不论我们的议题是气候变化的长久影响、能源的使用、种族歧视、财富集中、社会军事化还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参选人在大选前后都应当把事实准确地传达给大众。虚假的、误导性的宣讲在此次选举中没有立足之地，民众有权针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问题开展科学的合理评估。有悖此原则的商业媒体将被本次选举排斥在外。

客观事实与科学分析并不能保证避免严重意见分歧的出现。人性复杂，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客观分析理解方面的差异与政治偏见、恣意妄为、唯我独尊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这场选举将使公民成为公民，终结企业财团的罪恶行径，让公民不再被出卖给广告公司与咨询机构。我们要协助民众建立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让自由社会得以延续。

新闻业的堕落

新闻业并非可有可无的产业，更不是只有付费用户或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用户才可从中获益的服务性行业。如果我们的民众缺少可靠的信息源，如果他们因此只能依靠由跨国企业支持的公共关系代理炮制出来的片面报道来获取信息，那么我们将会与民主渐行渐远。

民主制度要求所有公民都能接触到准确详实的资讯。创造一种鼓励人们进行深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文化是实现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而非晦暗不清的未来目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开凿可靠的新闻源头，保证公众能够及时获得准确信息，铺设通往民主的大道。

宪法

宪法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比大肆咆哮的政客更具权威性。然而宪法与我们的父辈、祖辈一样，远非完美，需要予以改进修订，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面对当前的危机，有些人竟然说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需要用全新的法律体系取而代之。请记住，伟大的废奴主义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曾写道，宪法是“死亡之约与地狱之约”。他的意思是，从1787年制宪会议的本质而言，这份关键的法律性文件的初衷是保护私有财产，尤其是把某些公民当做私有财产对待的权利——即“奴隶制”。今天，权贵阶层仍然在把我们的同胞当做财产甚至牲畜来对待。当然，时移世易，可基本矛盾仍未解决。

但另一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坚持认为，作为旨在实现民主与可靠制度的文本，宪法具有生命，神圣而卓越，能够朝全新的方向改进，将所有民众纳入其框架之内。

道格拉斯的言外之意是，倘若详细阅读其字字句句，我们就会发现，宪法条文适用于每一位美国公民，即使其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因此这一文件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亟待发掘。

即使在此黑暗时刻，道格拉斯关于宪法潜力的论述也别具意义。

参选人履历和政党政策的了解渠道

对于参选人的遴选必须以宪法精神、道德原则和科学治国的理念为基础。换言之，不能给惯于进行暗箱操作的投资银行家与只知溜须拍马的小人可乘之机。

美国全部心怀愿景，有一技之长，立志实现社会、法律与经济正义，努力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好的美国的男性与女性，都应拥有以参选人身份参加参议院、众议院乃至总统选举的权利。

他们的能力、远景规划、道德品质以及支持他们的组织的性质必须在其竞选宣传中告知公众。此外，身为公民的我们，还有国家政府都身负重责：改进政治文化，鼓励理性辩论，引导民众参与讨论、持续关注当前时代真正的危机。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过程可以转变美国人民的思考与行

动方式，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开辟出这样的辩论空间之后，新上任的领导人便可冲破将他们与各个政党包围其中的特权高墙。出身民主党或共和党堡垒的政坛人士也会受到激励，不再把为金主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

将各个街区、各家各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参加公开活动、详细考虑各项政策主张，要比通过宣传为妨碍参与性民主而散布谎言、歪曲事实明智得多。公民可以通过集会在彼此之间结成纽带；日后这条纽带会愈发坚固，令民众得以自发地解决问题，而不必总是抱着依赖他人的心态投票给陌生人。

选举募金

大选背后的金钱游戏才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早在大家投票之前，各位官员的人选便已然确定，民众的喜恶对这一过程毫无影响。放任黑钱无尽涌入政治系统的“联合公民”执政是民主之棺上的最后一枚钉子。然而与乱伦之罪的情况相似，各位自封的统治者为了驯化公民使用的手段如此卑劣荒唐、侮辱人格，而人们竟然宁肯放低身段，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欺欺人地说下一次一切都会有所改善，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然而，我们有时不得不直面丑陋的现实——此刻正是如此。

上述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做好预案，不允许权贵为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令全体民众获得真实可靠的讯息，对当前问题与参选人的情况多了解，创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政策讨论。

要鼓励所有社会成员在阳光之下探寻心中的善念，远离隐藏在紧闭门扉之后的邪魔鬼怪。

如此改革选举过程似乎有些激进，但实际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路向前、有所成就。如今腐败黑暗的体制与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心知肚明。

广告宣传

广告是美国最大的公害之一。各式各样的广告大肆蔓延，已经渗透到了公共关系、形象塑造等领域，控制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从而获得了极大助力，得以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其真正的客户与意图其实根本秘不见人。

是广告商掏空了报纸和杂志的灵魂，让它们只剩下空壳。他们夜以继日、不厌其烦地劝说劳苦不堪的人们：邪恶的对外战争无休无止，超级富豪牟取暴利，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甚至合情合理。对于大选而言，他们，以及他们华而不实的电视广告百无一用。本次选举的宗旨是探索真理、寻求可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达成创建公正公平社会的使命。

本次特殊选举要如何开展

这一次，除了在美国举行有别常规的总统与国会大选，我们别无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此次选举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国际委员会的严密监督，遵守众多客观标准，使民众能够获得准确资讯，令合格的参选人拥有均等的曝光机会，保障全体民众的投票权。此外，所有投票记录都应整理列表，供日后核查；每一张选票的相关详细记录也应在选举过后予以保留。

开展符合上述要求的选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使到了2020年11月，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好准备。

我们无需为此而担忧。计划于11月3日举行的所谓选举必定会从本质上公然违宪，因此从法律、宪法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大选完全不可接受。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于2021年初另外举行极为规范透明的选举。具体日期可以由热忱正直的公民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决定。不过我的建议是，投票日期可以定在2021年1月15日到1月20日左右，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时间投票。当然，在最终投票结果经过科学验证之前，将不会有任何关于大选的报道出炉。

选举也可能会旷日持久，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临时政府做为过

渡。鉴于目前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完全不对法律负责，受控于钱财与权贵，因此哪怕组建临时过渡政府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关于这次特殊选举如何开展，我在下面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抛砖引玉。然而我还是要强调，相关细节应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确定，这里列出的只是总纲而已。

预算：

要让美国大选以透明、可靠的方式进行，一般需要一大笔预算。倘若我们叫停商业广告，杜绝向富豪筹金等腐败行为，禁止通过身份不明的政治行动团体使用黑钱，大选的耗费将大大降低。然而实施上述禁令也需要不菲的成本。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选举的举办经费——包括向公民传输各项相关信息所需的费用，不能由与大选结果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任何一家企业或任何一位富豪提供。

在正常的年代中，最好由政府来为整场选举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资助。可悲的是，我们并非身处正常年代。联邦政府与各个州政府都已将重要职能外包给私人企业；政府决策往往受强权利益左右，民众的需要却无人关心。

大选的预算制定过程必须可靠透明；应由同竞选结果不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员来控制预算。

考虑到美国政坛的腐败程度，这一要求似乎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然而，我真心诚意地相信，在美国可以找到品德高尚、勇气超群、设计得出公正公开的经费筹集制度的人。如果他们能挺身而出，将有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响应其号召、跟随其倡议。

必须为本次选举开辟全新的资金来源，保证所用经费与权贵阶层毫无瓜葛。如果由政府或其他身份公开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便要防止组织经费的使用过程轻易被人操控。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日期：

我建议本次大选为期一周，于2021年1月17日开始，2021年1月23日结束。这样各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使选举过程公开可靠，令全体公民都可参与、全体合法参选人都可把自己的理念介绍给公众。

一周的时间，可以保证人人都能抽空投票，所有与投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选结束之前解决。即使连日连夜辛苦劳作的人都要有投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时间同亲友邻居商讨。

本次选举的终极目标是阻止由企业财团支持的人获得权力与地位，保证公民充分了解选举的真正意义，让民众有充足的动力和责任感来在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

监督：

国会和总统大选的各个流程必须由可令其民主、透明化的组织严格监督。某些权贵派系妄图颠覆民主，损害民众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而该监督组织绝不能受他们的影响。

美国的选举系统已经深度腐败，因此现阶段我们需要让某一国际委员会来担此重责。然而具有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一定光明磊落、高度负责。

名称大气、形象光鲜却甘愿对权贵俯首听命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数不胜数。

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有勇有德之士，将他们组织起来、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担当重任，对本次选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径自管理我们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政治组织腐败至极，因此除了请国际委员会来监督选举，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一方面，其他国家已有宝贵先例。

但是，尽管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组成该委员会的，不能是民族国家派出的代表，而应当是不会被轻易被美国国内势力操纵的、民主过程与选举方面的专家。

该国际委员会将决定本次选举的大体流程，对其结果进行审查。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最终也要由该委员会来确定。

国内委员会

国内委员会将担负监督选举过程的职责；该委员会同样由德勇兼备、尊重正当程序和法治理念的人士组成。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唤回民主，有必要根据其道德立场来遴选该委员会的成员，摒弃民主、共和两党控制的腐败政治体系。

这一专为本次竞选组建的委员会将逐个州、逐个地区地详细说明选举流程，需要其解决的问题包括：取缔有违民主原则的选举团制度，防止为保护某一政党的利益不公正地划分选区、避免使用可靠度存疑的投票机，以及消除其他会影响到投票的严重弊端。选举过程的细节也将由国内委员会及其成员与民众共同敲定。

国内委员会将保证所有参选人都向公众发表演讲的权利，令竞选宣传围绕国家需要和有关当前问题与政策的科学分析而展开。同时委员会还会确保人人都可使用到计票准确、投票记录可核查的投票机，避免有人操纵选票。使计票结果精确无误、令投票机的筛选过程公开透明、避免投票机数据遭到篡改、将投票结果列印成可供验证的纸面记录——这些事项将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展望未来

在我们着手举办这场正统的选举时，谁都不该自欺欺人，对眼前的困难视而不见。民众可充分获得准确资讯、计票结果真实正确意味着众多势力即将失去特权。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阻碍社会向真正的民主推进。

然而，国家的需要如此之迫切，民众的愿望如此之强烈，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向民主迈进。请与我们携手同行。

“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

美国经济、制度与文化崩溃的速度有增无减，如今几乎人人都觉察得到，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而报纸和电视台只会粉饰太平，简直百无一用。我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道德荒漠和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奴隶王国。

然而，既然如此之多的人知晓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为何依然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为何这么多博闻强识、精明能干的美国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讨论零零碎碎的琐事？我们为何不能齐心协力，集毕生之力来改造社会，同左邻右舍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们束手无策，其原因多种多样。七十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甜腻的消费文化中，而创造它的，是各家广告公司。我们自从小时候会看电视起便开始接受这种病态文化的沐浴，逐渐沦为了影像和感觉的被动消费者。

社会腐朽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心中的权威人士与德高望重之人也都变成了这场恐怖狂欢的参与者——这简直荒唐至极。

然而我并不想通过解剖社会来寻找其症结所在——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来大批观众。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前所遭受的可怕创伤已迅速地恶化为坏疽。我们没有鼓起勇气斩去遭受感染的手指、阻止腐坏进程，而只是把创可贴覆盖在了创口之上，此后便闭目塞听，任凭腐毒在社会的血管中肆虐，直至感染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保守派、自由派、进步人士、社会主义人士——这场闹剧，人人都有戏份。

于是我们落得了如此田地。如果你尚未失业，倒是可以去冷血跨国集团旗下的星巴克同好友商量商量最近的假期该如何度过，或者聊聊你上周享用过的意大利佳肴。

然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忍受了一整天的煎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有的要寻找生计——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有的则受尽艰辛却拿不到一丁点薪水。我们几乎连给孩子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了无希望。生活很快就会回归正轨的童话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无人相信。

我们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没有自由，没有权力，被无形的大手抛来掷去。而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导致美国当前困局的三股潮流。媒体灌输给我们的、关于国家的宏大叙事宛若天方夜谭，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商场中，在起居室里，在办公室内感觉到涌动于表象之下的暗流。

这三股潮流分别是“运动风”、“抱怨狂”和“魔术师热”。这几个词并不为人所熟知，或许还会让人有不悦之感。这正常不过，因为我们就是要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让他们重新自行思考，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可以有所作为、切实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老调重弹，告诉大家只要改正某些错误，世界会依然美好，而是震醒诸位——将当前的情况轻描淡写本就大错特错。

第一个问题是“运动风”。

“运动风”指通过组织公众集会、筹募资金和开展各种活动来推动请愿书的签署、为某种观点或政策争取背书。它注重曝光宣传、形象塑造，以及利用营利性报纸和社交媒体来博得颓丧群体的关注。

各大运动的领袖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不仅出书，还会同政要、歌星、皇室与其他名人会面。

最具“运动风”的典型范例包括2002年以失败告终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以解决女性受性侵问题为宗旨的“Me Too”运动，以及由格丽塔·桑伯格开展、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系列活动。

这几场运动耗费了大量时间，耗资不菲，脸书上关于它们的热帖也数不胜数，让人们感觉媒体大力宣传的活动最终取得了某种成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反倒

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令责任心更强、真正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备受冷落。

沉溺于“运动风”运动的人往往满怀热忱，却毫不知晓自己的行动收效甚微。

于2002年9月发起、意在反对美国计划对伊拉克开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均是典型的“运动风”运动。它们轰轰烈烈，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我们听说是这样。还有几百名政府官员，甚至几位政坛名流挺身而出，抗议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未成功阻止那场旨在让少数精英攫取财富、毫无意义的战争。轰炸接连不断，两国的冲突持续至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提出抗议的人不计其数，为何一小撮权贵还能肆无忌惮地做出如此危险的决定？

为何关于上述抗议活动惨败原因的严肃讨论几乎无人开展？

在媒体上赢得关注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完全被这样的错误观念所误导。“运动风”的核心理念便是倘若大批民众了解真相，那么精英集团的决策过程也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影响。根本没有人考虑超级富豪的价值观体系或许与我们的完全格格不入。

媒体暗示大家：无人关注不足以成大事；要开展运动，名人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关注”正是媒体贩卖的商品，名人的支持也是媒体包装出来的偶像。“运动风”的关键所在是让观众相信一场场运动意义非凡、乐趣十足，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社交媒体恰恰可以通过宣传此类活动、博得流量而牟利。

然而唯利是图的媒体所报道的，都是那些无损于各大企业财团利益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也没有人会引领公众去探寻媒体包装出来的“英雄领袖”是如何从企业财团渔利的。

“运动风”是推行空虚消费、宣扬自我崇拜的活动的延伸，

其宗旨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构建齐心同德、为开展事业付出不懈努力的群体。

我们在甜腻的广告中沉浸得太久，想当然地认为一场运动在得到大笔资金援助、媒体的认可以及名人的背书之后，我们才能予以支持。

请记住，诸位，你们并非脸书和推特的使用者，而是被贩售给企业客户的商品。

脸书和推特服务的大企业为何要买下诸位？因为它们希望诸位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同时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真正的运动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反奴运动，它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转型，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大批民众的生活条件。规模盛大的反奴运动鼓励人们积极加入地方团体、定期会面、讨论国事、开展激进行动。所谓的“激进行动”，包括暗中开辟通路，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不断地将非裔美国人运送出南方，以及为自发团结在一起、在南部的种植园内进行激烈反抗的奴隶们提供援助。反奴运动的参加者们付出的牺牲鲜有记载，但他们的组织依然愈发地强大。

反奴活动家们建立起参与性的机构，也缔结起终生不断的纽带。他们并不痴迷于投票选举、分发请愿书让人签名，因为他们知道此类无关大局的行动根本不可能终止奴隶制的罪恶——而正是有人依靠这样的罪恶大发横财。他们的王牌不是富豪慈善家们的支持，而是他们自己舍生忘死的气节与意志。

当时，反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

“这场斗争也许是善与恶的交锋，也许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也许既包含道德较量，也要进行武力对抗，但这必须是一场斗争。没有外界的要求，权力不会让步——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自动让步。只要明白了人们会默默地服从于什么，就可以知道可以将多少不公与冤屈强压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用语言、用行动，或者

兼用语言与行动予以反抗的那一天。暴君能施暴到何种程度，要看受压迫之人能忍耐到何种地步。”

美国政治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抱怨狂”：媒体进行报道、以及我们在同亲友开展日常谈话时，总是不停地抱怨美国哪里不好、世事有多么不公，但既不深刻地分析其原因之所在，也不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绘制蓝图，甚至没有建议听众采取某种措施来提供帮助、改变现状。在这个方面，媒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新闻与政治探讨的这种论调令民众颓丧至极，以至于在面对灾难之时，我们认为自己无路可走，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因此有人不禁怀疑，这种残酷的“抱怨狂”之风十分讨权贵的欢心。

政治危机正在恶化，因为非主流媒体也没有让人看到采取行动的机会。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或许更加准确，但它们并未提供任何有益建议，告诉人们去社区的哪个地方跟邻居们讨论大事、组织集体行动。至于如何在不依赖于亚马逊、脸书、维亚康姆和微软等垄断企业的情况下做事，我们也无法从非主流媒体得知。

充斥着“抱怨狂”气息的新闻将报道重点放在唐纳德·特朗普、乔治·索罗斯、杰夫·贝佐斯等少数“害群之马”身上，经常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倘若这些人更有爱心、更开明，诸多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当前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成为贪婪与剥削的温床的？掌控金融、制造和贸易领域的少数人是怎样决定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企业如何通过国家发动战争、推广矿物燃料而获利，以及由此而生的利润怎样用于回馈组织运动、撰写“抱怨性”新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流入他们的退休金账户、或者变为他们的股票资产，这绝对是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知识分子本应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做我们的耳目，可他们与企业利润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此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无法建议公众如何行动。

我们如果组成团结高效、彼此互帮互助、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的团体，便可以着手改变经济与政治体系——“抱怨性”新闻一向对此避而不谈。

媒体中抱怨之风的抬头与近三十年来知识分子话语的堕落不可分割。营利性媒体在做分析时根本不会严肃地考虑历史问题，在谈及白宫或者国会时，也绝不会介绍这些机构的制度史。在这些媒体的口中，现在的中情局或者谷歌与十年乃至二十年前别无二致；至于它们内部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媒体则只字不提。

由于缺乏历史语境，读者只掌握了大量负面信息，既无法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最后一个是“魔术师热”——对政坛上的“魔术师”大加推崇。

媒体上的讨论时不时地透露出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选举出、要跟随出类拔萃之人，倘若他能力非凡，我们的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还有人认为，身为公民，我们就应当等到十一月投票选出此人，随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把一切问题都交给这位魔术师来化解。

在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旨在塑造“魔术师”的花言巧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奥巴马围绕“改变”这一口号大做文章，由民主党赞助的广告公司也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

他们启动企业资金，利用媒体和娱乐集团告知民众，这位才华出众、能说会道的政治人物只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就可以让美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言之，美国在饱受克林顿执政晚期以及布什掌权时期的罪恶摧残之后，只需要让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便可以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解决体制性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各阶层民众的力量，制定长期规划，清理门户——此举虽然危险，但十分必要。

但在奥巴马看来，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我们只需要给他投票，再告诉身边的人他将会立下怎样的丰功伟绩。

然而随后，果不其然，“变革”代理人奥巴马便沉着冷静、却又极为迅速地着手为企业银行纾困，为削弱金融监管助力，以此来回报他真正的支持者——帮他占据各家媒体版面的金融界。

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宣传也对民众颇具吸引力，然而他同样被包装为一个可以替我们化解各种问题的魔术师。他的竞选团队将工薪阶层赞助的资金献给媒体公司，让其在初选中播放极其昂贵的广告。桑德斯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然而他的团队却没有投入一分钱来建立可长期发展的地方性公民组织，让民众得以在政治上自给自足，为自己的改革提供持续动力。倘若说民主、共和两党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培养公民的依赖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让他们革风易俗难于令老虎吃素。

西达·斯考切波教授的《衰落的民主：由参与会员型到寡头管理型的美国公民社会》（*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一书详细描绘了美国人是如何逐渐远离基督教青年会、共济会、对外战争退伍老兵会、狮子会等定期组织集会、践行民主管理的地方性组织的。

五十年来，民众的活跃参与被一种政治性的管理文化所取代，导致社会民主与透明度大幅滑坡，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正是由于缺少公民参与，不负责任、暧昧不明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今天大行其道。

请问，诸位是否收到过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邀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如果只是在脸书上发文、抱怨唐纳德·特朗普的腐败行径，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美国有名无实的政治参与体系；健康的政治文化也绝不可能通过替政客从媒体集团购买广告来建立。

我们必须成立强势的、由公民组成、保持每日与民众互动的地方性机构。我们必须改俗迁风：关闭网络，敲响邻居的门扉，重拾与朋友讨论切实问题的好习惯。这些事没有人能够为我们代劳。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徠写道：

“要成为棋艺大师，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通晓棋路，熟知开局布阵与收局技巧，步步为营——这条途径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另外一条大师之路，则是由自己制定棋规。”

能让我们自己制定规则、创造崭新政治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然而当前美国的政治危机极度严峻，其影响无所不至，令我们在如履薄冰的同时也看到了发起彻底变革的宝贵机遇。我甚至可以说，除了投身战斗，我们别无他法。

2020年5月16日



何为安全？

何为“安全”一词的确切意义？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以至于其答案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尽管安全问题举足轻重，尽管投入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有数十亿、数万亿美元之多，在装修豪华的智库机构内招摇而行，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各种电视节目中向我们传教的众多安全专家还是不愿意谈论“安全”的真切本质。

有一点毋庸置疑：诸位上缴的税款，还有削弱了诸位购买能力的国债，都花在了新型武器与卫星、以及其他军事和情报项目的开发上。而此类武器、设备与项目不仅诸位从未听说，而且不必接受外部审查。

上述事物耗费了我们缴纳的税金，但业内人士坦言，自己对它们的开发设立、部署推进一无所知，因为与其相关的信息均属于国家机密，自然可以不对外公开。国防部拒绝接受稽察，情报机构也同样将意欲一探究竟的人拒于门外。

有一件事千真万确：我们正在为后代高筑债台，正在向世界大战阔步疾驰。我们正在用花在“安全保障”上的资金挖掘坟墓。想想看，届时睡入坟坑的会是谁？

尽管安保资金高达数万亿美元之多，可我们的安全感不升反降。

投入在安保上的巨资，以及撒向投资银行的几万亿美元，不仅变成了地狱大门的敲门砖，而且让国家经济淋遍汽油，如今亿万富翁的投资管理人正握着火柴在旁边跃跃欲试。

人们经常从军事角度来定义“安全”一词。然而十年来，士兵在“安保大师”的眼中轻如草芥。反倒是战斗机、卫星、航空母舰等颇具可疑价值的产品大受青睐，因为它们可以为企业带来大笔预算。

为何军官们明知军火无益于解决安全问题，却要不遗余力地为之背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退休后还可以被军火公司返聘。许多人之所以参军，就是为了方便在退休后从事咨询行业捞金。

当然，也有考虑真正安保问题的军方人士，但他们大多惨遭惩罚甚至驱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需要投身安保事业的有识之士。但年轻人常常被灌输给他们的童话故事所蒙骗，相信“邪恶国家”正对美国虎视眈眈，却对真正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

正是那些童话为不可示人的预算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而它们并没有科学依据，不过是国防承包商说客的讹言谎语。

将有一万多亿美元用于为美国的核武库改造升级——即使众多专家认为，倘若完全摒弃核武，我们会更加安全；即使我们也曾表示愿意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不再动用核武器。

如今，由于某些人唯利是图，旨在降低军备竞赛与核战争爆发风险、人们用五十年精心筑构的武器限制条约框架已经分崩离析。

美国正在与用于防止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爆发的国际条约背道而驰——宣布退出可保证军事行动透明度的开放天空协议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

此外，白宫表示可能会重启核试验，也令人震惊不已。上次美国发出此类声明还是在1992年。

美国以富有成效、果决理智的手段解决各种冲突的能力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惨遭削弱。在这段时间里，国务院预算被大幅削减，大批专家被撤下关键岗位，政府甚至连基本外交职能都无法履行。

与此同时，各大企业财团还在逼迫我们依靠军火生产来养家糊口。

他们心怀叵测，将所有制造车间迁至海外，在美国推行农耕与其他服务自动化。留给人们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制造业真真切切的生产对象只剩下了武器军火。在体制的胁迫下，我们不得

不为军需工业提供支持，否则便无以为生。

现在，我们深陷债务，工厂纷纷倒闭；留给腐败政府的唯一一条经济刺激途径便是计划同中国、伊朗或者俄罗斯开战。

众所周知，危险的灾难性战争计划正在顺利推进，可以轻而易举地招致人类文明的末日——哪怕这并非其制订者的初衷。

理性对待安全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可华盛顿方面的理性却所剩无几。

那么，在我们向战争深渊迈进之时，在我们的民众受媒体蒙蔽、对即将降临的末日毫无察觉之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亟待美国解决的安全问题？

我来陈述几条：

1) 反智主义

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便是反智主义恶性癌症的肆意蔓延、美国人民的低智化，以及在腐败媒体宣传的推动下深刻思考习惯的式微。独立于经济利益的可靠信源几乎绝迹，地方群体也已不再就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灾难的大门因此而开。

勇于追求真理是制定一切建设性安全政策的必要前提。倘若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短短的几分钟，倘若报纸、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不向民众展示就真正问题所做的具体科学分析，倘若我们浑浑噩噩、不做具有思考能力的公民，那么可行的安全规划将永远不可能诞生，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漂向世界大战。

2) 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气候变化灾难将在十到二十年内令大批人类无处安身倒是铁定的事实。

没错，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安全威胁从未受到过媒体的重视与强调，军方与情报机构花费了数万亿美元，不但没有令这场危机得到丝毫缓解，反倒让形势愈发严峻，因为美国军队便是

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几十年来，政府将管制一再放松，逐渐失去了勒令工厂停止毒害民众的权力。非但如此，受任登上产业管理高层的说客还将政府从无能为力的废物变成了青面獠牙、一心逼迫我们使用矿物燃料的猛兽。

所有关于未来三十年气候变化威胁的客观评估都表明，情况险恶至极，适应与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我们除了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大批量削减常规武器、弃用核武，别无选择。只有采取这一手段，我们才能集中资源人力，实现美国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型，令其脱胎换骨。

我们的目标，是摆脱不合时宜的危险军火，群策群力，不再使用矿物燃料，在短期之内改变全球经济框架。倘若军队、情报机构等现有“安保”系统部门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出力，那么它们尚有保留的必要，否则就必须予以关闭。

没有哪种型号的坦克、导弹防御系统或情报卫星可以用来阻止沙漠蔓延、海洋变暖酸化，防止农业生产因地球温度升高而遭到破坏。这场战斗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食品价格一路飙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无以果腹——这场悲剧即将揭幕，而少数超级富豪还在为囤积资源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根本没有用以应对食物供应系统崩溃、海平面上升等灾难的长期计划。许多美国人甚至对自己面前的危机一无所知，而当局已经沦为借矿物燃料攫取利益的工具，不仅无法制定可行政策，而且妄图叫停一切科学辩论，为自己清路。

3) 贫富悬殊

我们之所以无法有效应对安全危机，其部分原因是财富集中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十年来，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就连政府和军队都已沦落成为少数超级富豪手中的玩物。

家庭自营企业已遭覆灭，年轻人可以从事的工作愈发粗劣，

投资银行和其他投机金融机构利用权势影响国家的经济规划——这一切正在重塑我们的社会。

既得利益集团根本置民生于不顾，一心通过煽风点火、破坏安定渔利。富豪们宁可一掷千金，再以每架1.2亿美元的天价订购100架F35战斗机，也不愿意对民众施以援手，让他们接受必需的教育、了解他们正在面临多么严峻的安全危机。

除非没收超级富豪窃取的数万亿美元，建立高度负责、关注人民长期利益的政府，否则真正的安全政策将永无面世之日。

4) 新型武器的出现

尽管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酷的危机是气候变化，但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应对全球军备竞赛失控、颠覆性武器层出不穷等问题的重要性。

技术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革新，这意味着能够一瞬夺取数万、数十万生命的武器变得更为廉价，因此少数群体甚至个人都可获取。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全世界的相关组织之间建立信任。然而如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已经被权贵绑架，无法实现自己的初衷。

由谁来管控层见叠出的科技产品，应当如何利用、规管科技，对美国乃至全人类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问题。当下科技的发展利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可由此引发的危机只能通过签订国际协议、缔结国际条约来解决。

技术带来的威胁与民族国家无甚关联。危险科技产品的制造商与推销商所效忠的对象只有利润。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几种新兴技术产品：

1. 无人机和机器人

在意欲牟取暴利的企业推动下，杀手型无人机与机器人科技正在迅速发展。在某些贫困国家，失控机器杀人的反乌托邦惨剧已经上演。我们如果不签订条约予以遏制，机器杀手也会肆无忌惮

惮地踏入美国——为它们引路的并非别国人，而是美国人自己。

机器人和无人机的性能愈发先进，行动愈发敏捷，身材也愈发小巧，完全可以冷酷无情地发动大规模屠杀而不必担负任何责任。

未来将诞生这样的无人机群：它们由一万乃至更多架无人机组成，每架无人机都携带有不同的武器，而且体量微乎其微，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可以将所过之处变为不毛之地。届时现在的战斗机和航空母舰都会成为献祭给落伍安全概念的古董。

而自动杀人机器不必由人操作便可运行，因此它们必须成为国际条约的严格管控对象。我们只有先建立高度负责的政府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2. 网络战和宣传媒体

如今，大规模网络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旨在迷惑、分化我们的虚假信息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我们袭来；更有甚者，鼓吹复杂问题只能通过危险的军事行动来解决。

此外，未来的网络战中，少数人接管全世界的超现代武器将成为可能——届时电子控制技术已经应用于此类武器之上，这种设计可谓愚蠢至极。

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关于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基本观念早已名存实亡。然而，如果说现在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大国冲突模式得到了媒体更加卖力的宣传。

还有，像3D打印等其他新兴技术产品，人们对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仍不甚了解，但它们足以构成颠覆性威胁，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我们要何去何从？

我们的民众应当享有以追求真理为根基、以道德观念为引导的安全政策。如何通过贩卖军火来牟利等问题绝不能出现在政策讨论中。

将耗费资源、隐患重重的军队转变为保护环境、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主力是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

我并不想欺骗诸位说自己知晓正确答案。我此次演讲的宗旨，是确定问题之所在，呼吁全体民众、以及军队与情报机构的全体成员鼓起勇气，挺身而出，保护我们真正的利益，反对军国主义，拒绝贿赂，不惧威胁——正是这些罪恶的行径在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们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们没有必要同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兵戈相向。在我们面前的，是波及全球的严峻危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去应对。

让我们携起手来，连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一起改写安保规则，让有勇有谋、思想开明之人得到提拔，让他们利用道德的力量点石成金，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转化为彻底变革体制的良机。

许多人指责我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说我对安保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太过乐观。而我回答，我研究过历史，也曾从事外交工作；我认为对价值观和愿景的轻视只会令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

他们愤世嫉俗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民众已经受够了“妖魔鬼怪”和惊悚画面的惊吓。让我们启发、激励他们去开创大业、摒弃已被滥用的“安全”概念，为保障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奋勇拼搏。

2020年5月25日

运用政治合气道来平息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风波

在我们眼前，美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格局正在经历转型，其速度之快可谓骇人。少数群体垄断了资源、资本与知识，任凭我们广大民众在因邪恶政府失职而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一无所知地苦苦挣扎，不闻不问。

超级富豪一直在巧取豪夺，而过去的四个月中，他们又变本加厉，从诸位身上窃取了五到十万亿美元。我们刚刚振作起来准备对抗华尔街的罪恶势力，乔治·弗洛伊德先生便惨遭杀害，他被折磨致死的消息与可怕影像业已传遍全国。

警方的此类暴行每天都在上演，却有越来越多正直善良的警员被迫离任。对于广播和电视媒体而言，这一事件可谓天赐良机：它们可以以此为由煽动大规模的国内冲突，让富豪们从中受益——这群人唯恐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反抗他们掠夺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残暴行径。

美国有两条可怕的暗流，乔治·弗洛伊德先生的惨死正是它们汇合的结果。这两条暗流，其一是对“异族”、对“下等人”的仇恨与蔑视——某些人只因具有某种肤色、继承了某些生活习惯，便被打上了这样的标签。几百年来，富豪阶层一直利用这条仇恨之河来转移民众对无情剥削的关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联合主义政党也曾令黑人与白人联合在一起为争取社会公正而奋斗，然而他们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这场运动也以种族隔离的实施而告终。贫苦的白人得到了少得可怜的“特权”，统治阶级为推行“分而治之”策略让盲目种族主义的种子遍地生根发芽。

另外一条恐怖的地下暗河，是以牟利为目的对美国经济进行的操纵与破坏。美国的权贵自有派系，他们知道，国家一旦分崩离析，自己便有利可图，但此事只能在暗中操作。因此他们希望我们分化、内斗，希望我们无法和衷共济、为建立公正、公平、

透明的社会而努力。

为了让穷人彼此仇视争斗，黑暗势力花费的钱财不计其数。

我们根本不可能公开谈论气候变化、接种疫苗、政府与军队的职责、银行和跨国企业的权力等话题。灌输给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信息五花八门、彼此相异，以至于让人们难以在真假善恶上达成共识。许多当权者与魔鬼签下合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即使不加掩饰的谎言肆意蔓延也不置一词，以此来为换取名利与安逸的生活。

在新冠疫情问题上，媒体与当局故布疑云，令上述趋势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乔治·弗洛伊德惨遭杀害。摆在美国民众面前的，是用以做饵的策略，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要么质疑疫情的严重性与接种疫苗的必要性，被迫成为孤立主义与种族主义民兵的同盟；要么叱责政府奉行野蛮的种族主义，指斥特朗普当局鼓动种族主义暴行，最后不由自主地跟巴拉克·奥巴马、伊丽莎白·沃伦和一大群“持左翼思想、过右翼生活”的、身份不明的全球主义者站在同一边。

我想请问诸位，是谁令我们的处境如此尴尬？

我谴责这场残忍的谋杀，要求正义得到伸张。然而我请诸位像罗伯特·肯尼迪就马丁·路德·金遇刺一事所做的演讲中陈述的那样，动用自己聪颖的天资和与生俱来的应变能力。我再三恳求诸位！请不要踏入权贵为大家设下的陷阱。

坦诚面对我们国家社会系统中愈演愈烈的道德沦丧危机——我们必须以此为起点。

许多穷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被权势所误导，一味地责备他人——黑人、亚裔人、还有在农村劳作的白人，却从不整理思路，想想我们怎样才能群策群力，与黑暗势力抗衡。

我认识的人中，大多数都已放弃努力，不再架设沟通的桥梁。来自白宫的暴力威胁更是“架桥时代”已死的明示。

由于街头暴力势头不减，这场源于新冠病毒的政治危机迫使民众待在家中，只同与自己观念相似的人互动交流。所谓的“道

德领袖”对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大加推崇，认为可以通过它们来组织民众。然而这些社交媒体，以及我们读到的新闻，其诞生之宗旨便是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浅薄，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愚钝。除非自行报道新闻、自行构建社交媒体，否则我们必将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果我们无法在美国掀起积极的浪潮，给人们以进步的希望，如果人们目之所及均为残垣废土、争斗冲突，那么权贵便可肆无忌惮地推行阴谋，让我们彼此疏离，阻断我们的通信，迫使我们离群索居、再也没有机会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社交媒体来切实交流思想。谷歌绝不会告诉诸位，我们不过是笼中之鸟。

企业财团、投资银行正在压迫我们，在幕后支持各个反移民、反少数群体的组织作恶，冲击我们国家的顶梁柱。它们想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那一幕重现，让人们对少数群体的不幸遭遇习以为常。

他们想让诸位无视银行对政府的劫掠，一心关注街头的骚动——相关新闻在可恶的媒体上反复播出，我们却被迫对这些媒体依赖至深。

我们需要为未来的行动拟定计划，我们需要将这一计划贯彻到底。

政客无需告诉我们罪恶正在发生——他们都不敢解释自己为何作恶。我们没有时间怀着虚无缥缈的希望做梦，梦见有神奇的法术令一切焕然一新。

我们绝不能认为，冷酷残忍、傲慢自恋的唐纳德·特朗普被另一名腐败政客取代之后，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我们需要的是一套习惯、思想与行动层面上的全新政治体系，它既不“保守”，也不“进步”，变革才是其核心所在。这种政治体系应当能够铲除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拿各种怪诞的社会病征做文章。

我们要为乔治·弗洛伊德、为他的亲人、为他的朋友和同胞哀悼。于此同时，我们还要擦亮双眼，明白有人正在利用这场悲

剧，利用种族问题分裂国家、煽动国内冲突、为开展军事管制寻找借口。

唐纳德·特朗普曾经发过一条推文——推特也是一家玩世不恭、从你我身上榨取暴利的营利性企业，说“敢抢劫就开枪”（When looting starts, shooting starts）。据说推特屏蔽了这条推文，理由是它推崇暴力。我对此深感怀疑。这些媒体公司明明在为了控制我们而绞尽脑汁；它们发布虚假的影像，使用哄人的招数，目的就是让我们以为它们客观公正，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朋友。

警方的暴力执法问题与美国参与的恐怖对外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警察都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而电子游戏、电影和军事化的价值观体系也为他们的暴力行径提供了温床。遍观整个社会，暴力问题已经无处不在。

作家詹姆斯·鲍尔温曾这样描写那些受潜移默化、习惯于从种族角度观察世界的人：

“其实他们依旧受困于自己并不了解的历史；除非清楚真相为何，否则他们将永无脱身之日。许多年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迫使自己相信黑人逊于白人。他们之中，心内有数之人并不在少数，然而你会发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行动就要负责，负责就会招致危险。在种族歧视这件事上，在大多数白种美国人的心中，这种危险是失去自己白人的身份……在白人的世界里，黑人宛若一颗恒星，一根不可挪动的支柱：一旦后者发生位移，前者便会经历一番天塌地陷……”

“要说‘融合’一词尚具意义，那就是：我们用爱让同胞认清自己，让他们不再逃避现实、着手改变现实。因为这是你们的家园，我的朋友，不要走上流亡之路。曾有伟人在这里创下丰功伟绩，辉煌还将重现，我们也能令美国成为它该有的样子。”

鲍尔温直言不讳，叙述了应当怎样让美国变得伟大——不是让它再度伟大，而是要开创伟大之路。

我们应当何去何从？

我们可以从合气道这种古老的武术中寻求解决社会与政治危机、摆脱内外困局的灵感。然而我们首先要针对美国的动态开展深入、理性的宏观思考，探寻我们究竟为何落得如此境地。尽管合气道之术并不会吸引希望任性妄为之人的目光，但在整个世界都极有可能陷入灾难之际，它或许是最为有效的良方。美国的骚乱无法与它同他国的龃龉冲突割裂开来，美国数不胜数的对外战争为它的街头暴力事件提供了土壤。是民众目不可及之处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我们。

如今，一旦事态失控，谁控制核武这一问题就很可能导致明天的危机。

腐败媒体正在竭力用图像摧毁我们的理智，而我们可以从合气道之术中领悟到静心自抑的秘诀，集中精力建设我们自己的社区、创立英勇的组织，同躲在电视影像之后的势力抗争。

合气道告诉我们，面对敌手，不能以硬碰硬，而应当借力打力，化被动为主动。

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以柔克刚。

“借力打力”“以柔克刚”——这两个成语中蕴含着大智慧：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平衡，应当让它为我所用；只有顺势借力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

政治史无比清晰地展示了真相：以硬碰硬，“矫枉”往往会“过正”，导致新的问题，有时甚至会令情况比采取措施之前更为糟糕。每一个时代都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而民众反应过度正是美国的黑暗势力所乐于见到的，正中他们的下怀。

但是，我们又不能让民众默默地忍受不公。正如爱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所说：“懂得退让永远是一种美德，可不坚守原则永远是一种罪恶。”

如果让一位合气道大师教导我们应当如何重建这个经历过精神浩劫的国家，如何应对幕后势力对我们的摧残，他会怎么说？

要使这个深受商业化、商品化玷污、支离破碎、惶恐不安、道德败坏的国家复原如初，他会建议我们从何处着手？

腐败媒体和黑石、高盛等银行之所以要煽动可怕的种族冲突，就是为了让对峙的双方民众走极端、争斗不休，让人们无心关注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怎样的劫掠——强盗并非拿低薪的工人，而是银行和发国难财的富豪。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暴力事件的负面影响。然而，倘若我们运用想象力、按行自抑，就可以做到借力打力。

民众已经从沉睡中醒来。

这是好事。

之前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的民众已经对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

这是好事。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有时彼此合作，有时针锋相对。

这也可以成为好事。

有人煽风点火，为了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传播建筑遭毁、社会混乱的影像。

这绝非好事。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追求真理，不被耸人听闻的报道所左右，如果我们抓住民众觉醒这一时机，鼓励他们同彼此、甚至同他们原本憎恶的人交流探讨，那么这股旨在离间我们的力量就反而能使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在民间，在家中，在社区里展开深度对话，让大家一起讨论美国真正的历史是何样貌。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

美国是从何时开始出现问题的？

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走向了堕落，还是这个国家本已陷入无尽的战争、腐朽不堪，而特朗普不过是道出了真相？

克林顿任期后期与乔治·W·布什当政时期，体制的腐败是否便已根深蒂固，严重问题是否自那时起层出叠见？

难道我们要回头从约翰·F·肯尼迪的遇刺事件中寻找美国的病根？

难道十七世纪欧洲四处殖民、为牟取暴利引入奴隶经济时，罪恶便已在我们的国家扎根？

还是说，要将人性的堕落归罪于亚当和夏娃？

对于美国而言，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而它们的答案并不简单。

我们必须令当前席卷全国的动乱浪潮转向，利用这股力量来激励民众，启发他们参与建设性讨论，从而实现最深层次的变革。比起媒体与它们背后的金主大肆渲染的、充斥着暴力与苦难的消息，这样的讨论要有意义得多。

我们在电视上见到的政客都是挑拨离间的专家，熟知分化民众的关窍。

然而，我们可以建立鼓励大家团结合作、转变思维方式和面对现实的政治体系。

负面力量正在我们的国家肆虐。在这场利用它来发起变革的战役中，大家各有分工。

我们之中，有些人要接受教育，掌握专业知识，以独特的方式了解世界。而我们知识阶层则要担起责任，帮助身边的人以更为清晰的视角认识世界，让他们不会再被强权压迫欺凌。

于此同时，我们知识群体还应当同劳苦大众多多交流，明白这些在餐厅中整日工作、居住环境简陋的人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我们可以同对社会疾苦有切身体会、但缺乏改变现状所需知识的人一起工作，互相取长补短，从而建立良性循环。

工人与知识群体的同盟具有反压力为动力的力量，但要实现这种转变，包括我在内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有做出牺牲的意愿。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不要浪费大好危机。”人们一般从负面角度理解这句话，认为它的意思是应当趁危机爆发之时推行民众在平日里绝不接受的变革措施。“9·11”事件后，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通过就是典型的例子——若非人为制造的危机感在社会中蔓延，人们断然不会允许自己的自由受

到如此之大的限制。

如今，这种危机感又被人放大扭曲，令美国社会面目全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替财富集中、破坏环境、削弱公民自主性、束缚民众铲除障碍。

然而，我们倘若详加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恶行竟然催生出某些积极的变化。将其善加利用之后，建设性的变革便可顺势展开。不可抗拒之力已然破闸而出，我们别无他法。

举个例子。在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参与性过程、甚至没有同专家商讨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即做出了严控跨国旅行与国际贸易的决定。航空公司纷纷破产，机场惨遭关闭，港口也寂静冷清。

但是，尽管这种情况导致了政治的逐渐专制化，可我们也应当看到，石油出于运输目的的使用与推翻传统、走向失控的消费型社会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态系统。现在正是关闭全球化机器的大好时机；如果我们有重建社会的愿景，那么当前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的中断其实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空中运输必须叫停，可有可无的旅游必须休止。

的确，政府颁布居家令限制级人们外出，导致大量中小商铺和正当公司倒闭，超级富豪趁此机会攫取暴利，我们却难以为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性的闭锁是一股负面力量。

但同时，倘若导向正确，待在家中、同家人一起工作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大家必须待在社区之中，所以现在是组建社团、与权贵对抗的良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邻居增进了解，学习如何与他们合作。

上网课可以减少大家对乘车出行的需求，甚至可以让全世界的师生以崭新的方式建立联系，开辟人们的国际视野，可是当下的线上教育一般是由追逐利润之人安排的。我们必须抓住线上教育的控制权，改变它的发展方向。

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也只不过是建议。我们需要齐心协力，阻遏、扭转在美国冒头的危险趋势。

我还想建议大家，在为死者哀悼、为社会遭到破坏而悲叹之

时，我们也要睁大双眼，寻找全新的、创造性的方式，化危机为良机，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直言不讳地讲，这样的变革实在来得太晚太晚。

政治与政策的合气道之术十分复杂微妙，大多数政客都没有提议将其用于拟定政策的勇气。他们认为必须将信息缩略简化，因为美国受众早已被社交媒体和商业广告愚化，根本无心聆听繁枝细节。

但我是认真地对待诸位，我的同胞们；我绝不会居高临下地同你们讲话。我认为，站在沃尔玛柜台后面的你们，在亚马逊接单的你们，深夜在麦当劳擦桌子的你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些复杂的问题，你们能够，也愿意迎难而上。你们可以摆脱害人不浅的消费文化，在这场抗争中阔步前行。

在携手前进之际，让我们回顾一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1月6日在国情咨文中绘制的愿景——这篇演讲也是向法西斯主义挑战的宣言。

罗斯福呼吁保护全体民众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罗斯福毫不含糊地点明了这四项自由的意义。

他说：“未来，在寻求安宁之时，我们盼望见到的，会是一个建立于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首先，是言论与表达的自由，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人们都可以畅所欲言。

其次是信仰自由——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信奉神祇。

再次是免于贫困的自由——世界各国能就经济问题达成谅解，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能安居乐业。

最后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彻底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大幅军备裁减，直至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其邻国进行军事侵略。”

实现如此伟大的愿景需要我们呕心沥血、坚持不懈，需要我们走上街头，同四邻一起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或许我

们已在偶然之间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如今正是我们趁机迈向光明的时候。

2020年6月3日



“ 特朗普总统，每天的说辞都不同，是愚昧还是疯癫？”

全民基本收入：经济自由还是迈向奴隶制的第一步？

民主党初选期间，安德鲁·杨做出了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提议，并围绕这一计划描绘了美国的经济愿景。该提议得到了伯尼·桑德斯的响应；他表示，丹麦、芬兰等国推行的收入保障体系或许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

杨和桑德斯都认为，美国的生产自动化以及技术领域的其他变革对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国家经济繁荣形成了负面影响，而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是解决当前困局最为有效的手段。

基本收入计划利弊兼备，是否施行这一计划需要全民、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充分讨论。然而在当前压抑的环境之下，此类讨论根本不可能开展。

如今，我们被强行纳入了全民基本收入框架，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的民主程序，也无人对此负责。这笔收入被人称作“冠状病毒救济金”；报纸告诉大家，倘若国会通过法案，还会另有1,200美元寄到我们手中。

让我们退后一步，仔细考量政府寄来的这张1,200美元的支票。当前停工停产的防疫措施令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无法继续经济生活、无以为生，而这笔救济金是我们得到的唯一一笔收入。不论诸位赞成与否，它从其本质而言都是“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形式。然而，是不是有了这笔收入，民众之中就又会出现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大家就会踊跃参与志愿服务，我们就有了充分实现自我的经济保障？

不，很遗憾，这笔全民基本收入兀自从天而降，无人知晓是谁做出的决定，当然也不会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在这笔钱的数额和领受群体等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发言权。有一件事确定无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笔钱远远不够。

同时，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讨论都把“收入”作为美国

人民的头等大事，可没有一个地道的经济学家会相信这番谎言。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资产，在于资产的所有权，而控制资产的，是极少数富豪。

过于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令美国经济停摆，在短短几个月内导致了大规模失业。这场早有预谋的、人为的经济破坏令我们只能靠乞求全民基本收入过活，而正有一笔钱发到了我们的手中。

与此同时，亿万富翁和企业财团的CEO们却获得了数以十亿计的津贴。他们不需要领取救济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投机、印钞，通过掠夺我们攫取暴利。新冠疫情导致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只要这一转移过程仍在继续，基本收入便不会对改善民生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惨遭驱逐排挤，政府随意限制人们自由行动，我们的小店因此而关门大吉。不用多久，许多人便会陷入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窘境，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

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财富已经以指数级的速度流到了富豪手中，单单发放救济金而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只会招致可怕的灾难。先令我们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再逼迫我们接受救济，这根本是一场犯罪。

十二年，尤其是上三个月以来，超级富豪已经通过美联储印制了巨额钞票，并把由此而生的暴利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倘若我们不夺回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经济不平等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

在诸位不经意之时，已有五万到十万亿美元无影无踪。只要我们对美国人为造成的贫富差距不闻不问，只要我们任凭社会上层的强盗将掠夺之物握在手中，政府的救济金就不是白白送给我们的。其背后是你我缴纳的税款——当然不包括将总部设于海外的跨国企业交的税金，是与日俱增的国债，是民众日渐低下的购买力。

我们无法自己种粮发电，无法自己缝制衣物、打造家具、制

作所需的日用品，只能在跨国企业运营的大商店内用公司支付的薪水购买商品，那些由国外低薪工人生产的商品。

政府已经变成了权贵手中的玩物。高层政府官员、法官、甚至中层官员都要有跨国财团和投资银行的授意支持才能得到任命，政坛更是黑暗腐败。

政府中真正的专家都已离职，政府的基本职能已经外包给私人公司——它们承担了政府以往的工作，眼中却只有短期利益，视民众为草芥；它们的工作酬劳来自你我支付的税款，可它们从不忠于宪法，只把向老板输送利润当做首要使命。

只有在财富得到重新分配，政府行动完全透明，禁止富豪及其所控制的企业、银行肆意妄为，保证他们不再干涉政策制定、造成危险影响之后，我们才可以拾起基本收入这一话题。

我们需要考虑银行为何想让我们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为何希望我们被动顺从。毕竟，倘若我们所有人只能围坐在电视机面前等待救济金支票邮寄到家，那么我们就无法组织在一起采取行动，无法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技术与所谓全民基本收入之间的关系。杨和桑德斯的观点是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作岗位大幅削减——虽然生产力大为提高，但其他领域的工作岗位并未因此而增加，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来保护被新型技术产品取代的工人，保证他们的就业，让他们能够适应新的就业环境。

他们认为，就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普及，还有人人互动的终结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无需纳入政策讨论。

然而，我们是否真的走到了别无他选的境地，是否一定要撕裂社会的自然秩序，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迎接自动化产品、无人汽车、机器人和无人机的统治而向贪得无厌、残忍冷酷的科技之神献祭？难道物联网真的可以交织出天国一般的世界？

普及人工智能是否符合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灵契？或者说，推广这种技术只是为了充实少数人的腰包，同时把普通大众推入贫穷困苦、依赖援助的深渊？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显而易见。回答它们需要就社会、技术、治理和经济问题开展公开讨论，而其参与者不仅仅是专家，还应包括对技术的正负面影响理解较为深刻的普通民众。还有，这场讨论应当秉持透明原则与科学精神，没有一心想从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渔利、将私欲包装成为科学事实的富豪的容身之地。

他们用生产力的提高来为基本收入计划正名，可就业岗位并没有因为推行该计划而增加。生产力就像是一头圣牛，除了受膏的大祭司，任何人都不得近身，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被炮制出来、用于东遮西掩的虚假概念。它不是万有引力定律或者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一种片面强调某些经济活动重要性的扭曲观念。

在编造生产力定理的专家眼中，照顾生病的母亲、打理社区菜园、为残疾人提供志愿服务、陪孩子玩耍等活动都不具备生产价值。

然而，倘若诸位为建设可有可无的商城毁掉森林或者农场，用工厂化农场、铀矿开采地排放的废水污染河流江湖，倘若某国四处宣战，他们却会认为这一切都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就业多寡与生产力高低之间的断层并非单纯由科技变革所造成。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此时此刻美国所处的历史地位，考虑我们来自何方，然后才能讨论我们要去向何处。

上个世纪，采用市场经济模式的欧美各国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苏联和中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冲突，我们称之为“冷战”，其实这个词并不确切。

美国奉行这样的理想：只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成就，任何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个人的自由远比集体利益更加重要。

而社会主义阵营则认为，经济平等是健康社会的核心，应当未雨绸缪，预先采取措施来保证经济上的相对平等。

我在美国长大，我们都相信这里会有公平的经济环境，相信只要途径正当，能者多得天经地义。

然而，我们想当然的事情并非现实。大规模的财富集中、对劳工的剥削、对童工的欺凌已在十九世纪晚期成为常规之事，甚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乱象都没有停止。

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还是在不断令美国倍感压力，被迫在条件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完善体制、容许社会更为公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国内革命一触即发，人们不得不针对劳工问题采取行动——若非如此，这些问题将永远无人重视。

我们或许并未感觉到这种压力，但正是它使得最低工资等民生福利成为可能。

当时，CEO们的工资有上限，富人税税率上升到了90%，亿万富翁不见踪影，离岸天堂也无迹可寻——并非因为富豪良知未泯，而是由于国家受压力所迫。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向商业化迈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日趋缓和，美国便慢慢地重新拾起它曾奉为至宝、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工人再次变成了消耗品。这一次，自动化科技、无人机和机器人令美国社会成为了更加冰冷血腥的试验场。

然而，气候变化等缓慢发生却又真正严峻的问题却无人关注。我们沉迷于电子邮件和脸书，根本无暇顾及。

我们曾经奉行的法则早已消逝，一个表面光鲜、内里凶残的全新世界已然崛起，我们却无知无觉。

最后，我想说，除非着手建立崭新的文化与制度，让与黑暗势力对抗、维护普通民众利益的力量有所依附，否则美国的“全民基本收入”便毫无意义。这才是终极问题之所在。而汇成这股力量的，必须是你，是我，是我们，而不是专家和政客，更不是生产操纵无人机与机器人的各大企业。

2020年6月7日

病狂状态之下的美国

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的兰斯·窦兹医生告知MSNBC（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特朗普“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在变成疯子’，或者干脆说他已经疯了。”他的话不无道理。

毕竟，特朗普前一天威胁对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后一日便宣称对上述两国的领导人抱有好感。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可在此紧要关头，特朗普却彻底叫停了相关研究。他和他的同伙坚持要让美国退出所有的武器控制条约，并成功地、未遭任何抵制地启动了新的太空军事计划，将我们推至灾难的边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或许在整个世界史上，我们从未陷入过如此危险的境地。

特朗普于二月五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称“美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工作成果超越了以往历任总统所获得的全部成就。他一再对自己表示祝贺，可这片虚假繁荣景象的背后，是为所欲为的投资银行，以及受它们资助、大量回购股票的各大企业。他对大批即将破产、无家可归、或者身陷牢狱的美国民众视而不见，再次证明自己本领高强，能够对所有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换言之，他用行动表明自己具备教科书上的精神病患者所表现出的一切症状。

然而，倘若独行，他还不会陷得如此之深。他需要精神病头头约翰·博尔顿推他一把。博尔顿是这样的人：光是想想将世界推入核战争的深渊便会欣喜若狂，同时还在不知疲倦地为同时在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挑起战争而摇旗呐喊。世界的前景越是黯淡无光，他便越是热情高涨。

如果爱尔兰的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活在当下，那么他写《基督再临》时，脑子想的肯定是博尔顿。博尔顿“放出了血染之潮”，波涛过后只留下一片狼藉，令“至善者毫无信念，极恶

者激情满满”。也就是说，那些良知尚存、或者前额皮质能正常工作的人士如逃离下沉船只的老鼠一般纷纷弃国务院而不顾之后，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真空地带被博尔顿占据了。

但是华府的其他地方现在又是什么模样？

让我们看看近日来华府“反对派”的表现。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加州民主党人）向媒体大肆抱怨由于特朗普提前公开她前往阿富汗“支援军队”的行程，她可能会身处险境。但针对以下重要问题，崇尚自由的佩洛西反倒无话可说：有多少美国劳工在阿富汗惨遭杀害（死于非命的阿富汗人民更无人问津），关于美国军队的报道为何销声匿迹，尤其是美国当初为何入侵阿富汗，又为何至今仍未完全撤出。

佩洛西一心到处宣讲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到了怎样的镇压，却没有为寻找切实证据而付出一丁点儿努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死于美军之手的穆斯林有几百万人之多，她对此却未置一词。换句话来讲，她一方面主张建立公平的世界，另一方面却完全能够接受各种军国主义言论。老实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

那么总让某些人泪眼模糊的巴拉克·奥巴马呢？难道只因为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大家就会忘记他是怎样为一己之私而牺牲普通百姓的利益，为免遭人身攻击而将灵魂贩卖给高盛和摩根大通的？要知道，来自对手的抨击本是真正改革家的荣誉勋章。当然，对他来讲，将盛在银盘子中的各种溢美之词照单全收显然更为惬意。

他的妻子米歇尔最近出版了《成为》（*Becoming*），这本预定的畅销书简直是当前政坛反乌托邦状态的象征。她十分巧妙地用自己优渥生活的片段来掩饰美国治理体系的崩溃与文明向野蛮的沦落。也许米歇尔跟希拉里·克林顿一样，觉得自己获得各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乔治·W·布什——这场噩梦开始的前八年里坐在政坛宝座上的人——是自己的“共犯”，这绝非口误。她的话折射出一种自由秩序分崩离析之时的精神病晚期症状。

看到这里，各位也许会想，奥巴马夫妇并不是真正的反战进步人士，不过我们毕竟还有伯尼·桑德斯，针对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进步人士。

早先民主、共和两党会为特朗普胡言乱语中的每一个虚假承诺、每一张空头支票鼓掌喝彩，这种情况已经足够糟糕。然而目光短浅的桑德斯把注意力放在工人薪酬和“普遍不公”上，至于军费猛增，美俄、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以及在其好友奥巴马就任期间便已存在的财富过度集中等问题，他却置之不理；他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桑德斯的确提到过，某些地方有压制选民的现象，令人遗憾，但他忘了，选民压制明明是一桩重罪。

既然桑德斯不请自来，我们就得回忆一下他在上次大选时的所作所为。他就工薪阶层的艰辛生活做了感人至深的演讲，听众多达几万人；他提到了一场革命，让连房租都付不起的人捐款给他，说这样他就有资本跟亿万富翁们一争高下。他们听从了桑德斯的召唤，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把他推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可是，桑德斯的当选之梦被克林顿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要么是通过在初选中操纵选票，要么是靠四处传播关于他的小道消息，然而当时他却默不作声，仿佛那些由支持他的美国百姓投出的选票沦为废纸只是他自己的私事，跟他人无关。

桑德斯在民主党大会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了降，令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他转而支持克林顿，让为他的选举大业做出牺牲的人一无所获。不知各位有何想法，不过在笔者看来，先是就公平社会大说特说，进而拿着劳动人民的钱财参选，然后又为了留在权力之门以里背叛他们——这明显是他罹患精神病的危险讯号。

可是，我们不是还有亚历山大·奥卡西奥-柯特兹——让稀里糊涂的美国年轻人浮想联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吗？尽管她的演讲饱含真诚，但她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对俄制裁表示支持，同时严守民主党议程，令人难以对她抱以希望。

也许你还记得，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上，奥卡西奥-柯特兹曾表示，“让亿万富翁有存身之处的制度是不道德的”。但她的办公室是游说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都是认为媒体就应该由大企业掌控的重要人物。也许正因如此，她才没有建议立法关闭海外避税天堂，更没有提议没收亿万富翁们的非法所得。这些富豪积攒财富的手段，要么是通过兜售战争来操控市场，要么是大力推广矿物燃料的使用——他们的做法，足以毁掉人类文明。

走入我们视野的，还有身为“进步人士”的卡马拉·哈里斯。是她呼吁倘若哪个小学生逃学旷课，那么其父母就应当受到包括入狱在内的刑事处罚，是她建议证人可信度对被告保密，是她不遗余力地为失职警察辩护。这样看来，没错，她是精神病院里的进步人士。

美国政坛病态乱象之起源

这些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由宇宙飞船突然空投至地面的。他们虽然行为反常，不似地球人，但也是十足十的美国出品——生产他们的，是一个处于疯狂状态的国家。金门大桥、好莱坞大道、自由女神像和大峡谷依然引人入胜，但在这光鲜表面的背后，美国已经变了，变得面目全非。

家人、社会成员以及国民之间的羁绊被商业化的消费狂潮侵蚀殆尽。以往秩序井然的政坛和公民社会如今已沦为荒漠。

我们不该把这场噩梦完全归咎于身处社会最高阶层的人们。如果他们那唯我独尊的病态心理没有受到煽动，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如此疯狂。而煽动、满足他们的，不只是亿万富翁，还有广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人士心心念念的是变成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而不是对周围无家可归的同胞施以援手。但是中产阶级人士轻视的那些流浪汉或许也曾跟他们一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病态行为已经在整个阶层中扩散开来：律师、医生、教授、记者、企业CEO、政府部门主管，还有，没错，还有工会首脑。

这些既得利益者达成了一种共识：不要问眼前这无情的政府和企业政策从何而来，不要问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有何关联，尽管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持有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股票跟气候变化之间有何联系，私人监狱的激增和投资银行的暴利之间是何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禁忌话题，就连哈佛大学的优秀年轻学子都无法加以琢磨。

这种心态让他们得以在富人区过“优雅”的生活，在星巴克高谈阔论，在全食超市挑选精致素食食材，同时理直气壮地将核战威胁和生态系统的崩溃抛在脑后。在商场很容易就能买到便宜货，至于哪些出自美国监狱里的犯人（奴隶）之手，哪些是血汗工厂的产品，几乎无人问津。我们可以把这种心态称为“省大脑，日子好”。

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信息渠道，从而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的人觉得没必要跟一般民众分享自己的看法。他们更愿意在这些禁忌话题上装傻，把讨论话题限制在全家出游的场面、在风味餐厅吃到的美食等琐事的范围内。

更加荒唐的是，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常常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作“傻瓜”。他们看得懂印象派画作，欣赏得了前卫舞蹈，却无法想象有些人所住的地方，学校不开展智识教育，存在的媒体上尽是假象与谎言，那些“傻瓜”只能去右翼势力的教堂探寻自己渴求的生命之意义。

乔治·W·布什及其拥趸接管联邦政府之后，许多这样的“美国良民”接受了一种拒绝承认现实的文化，而这是整个社会病态化的第一步。现在他们仍旧顽固地认为，特朗普的肤浅庸俗无伤大雅。然而，正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论述德国政坛如何沦为野蛮狂欢时说的那样：“无趣并不是无害的代名词。”

病态乱象之本质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知道，为自己加冕的民主党，

其领袖最擅长的就是将第三党排除于政策讨论之外，与所谓政敌眉来眼去，为自己存大笔大笔的养老金，给退休生活做准备。这样的政党，根本无法应对特朗普的罪行。

你可能会以为，两年以来，特朗普及其拥趸一直在为保护少数富豪的利益而公然破坏美国经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在目睹这一切之后，会挨家挨户地发动民众，组织开展大规模运动，推翻超级富豪、军国主义者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阴谋集团。

然而你也许错了。

不论社会制度遭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他们都不会放弃“民主党崇尚自由”、“共和党倾向保守”这样的假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目前仅有的主要党派都是妓女和皮条客——或者讲得再直白一些：“其实只有一个党，呸，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他们，春夏无言，秋冬不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尚有百万人对各种凶兆有所察觉，深受启发，走上街头，发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回望那时，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比起那时，现在的情况更加不堪。我们的面前，是核战，是会导致人类灭绝的气候变化，是伴随着罪恶的财富集中。可是很少有人能够主动跟朋友和邻居讨论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更是寥寥。

或许我们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那样，正在走向衰亡。难道唐纳德·特朗普就是电视真人秀版的尼禄大帝，是山寨版的卡利古拉皇帝？他决定提议女儿伊万卡做世界银行行长，从这一点来看，他倒是与上述恣意妄为的罗马皇帝别无二致。

由荷兰设计师维克多·霍斯汀和罗尔夫·斯诺伦联手创办的维克多&罗尔夫时装公司总是能赋予高级女装以别具一格的视觉元素。在他们的时装展海报中，有一张特别吸引眼球，不落窠臼，于是它被选中成为了该公司回顾展的主海报。



发狂的美国民主主义

它的画面奇巧玄妙，压迫感十足。一位白人阔太身裹华丽红毯，头发披散在高档枕头上，仿佛是在卧床休息，但她的身体其

实是垂直于地面的。她用右臂搂着一个金发婴孩，这场景颇有文艺复兴时期圣母画的韵味。女子脸上挂着慵懒不屑的表情，透出的是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还有高傲冷漠。

但海报背景与这位阔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母子身后的，是一片残垣瓦砾——也许那原本是某人的家，但被卡特里娜飓风或者迈克尔飓风化作了废墟。

有普通百姓因基础设施崩溃、气候变化和紧缩政策事实而遭受的苦难做对照，那位阔太养尊处优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神往。这个画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让超级富豪和梦想成为超级富豪的人们间接地体验了平民之苦，就好像玛丽皇后喜欢做农民的感觉，于是命人在凡尔赛宫里建了个小农场。

在此类画面中寻找审美乐趣无疑是一种病态行为。毕竟富豪们是靠采掘业和矿物燃料来充实自己的季度收益报告的。正是因为他们欲壑难填、索求无度，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灾难才会此起彼伏，令画中这样的贫苦民众无家可归、一筹莫展。

他们掩耳盗铃，骗自己说单靠购买土地、建设地堡就能捱过气候变化的劫难——《纽约客》的欧逸文形象地称之为“超级富豪的末日求生之举”。

这种病态文化在整个社会遍地开花。强行闯入年轻人视野中的，是一则则广告：一个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迷失在索然无味的世界里却自命不凡。广告商把这样的人物立为楷模，暗示观众：要想走出社会不公的困境，就得向最富有的人顶礼膜拜。

谷歌和脸书是如何限制美国人的思维的

但是，催生上述种种的只是周期性社会衰落一类的因素吗？极度认知失调的受教育人群能够心安理得地对气候变化与核战威胁视而不见，这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迅猛发展的科技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理解周围变化的能力，并让我们沦为游戏、社交媒体、色情作品和其他消遣品

的被动消费者，无法对众多危机做出积极回应。

难道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手中的智能手机改造，因此哪怕我们到了入土的那一天，也只能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漫画家史蒂夫·卡兹在他的动画短片《你是否跟我一样迷失于世》（Are you lost in the world like me）中，刻画了一个人们互不理睬的噩梦世界。被动消极的心态正在时刻影响着各个阶层。



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互联网在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The Shallows*）用大量科学实例说明了互联网是怎样改变我们大脑对瞬时刺激的响应机制，从而使其失去进行复杂思考的能力的。身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使用着同一种科技，浏览着五花八门的事件却不知其所以然，能够彼此联系却又互不关心——这片暗黑之潮正在迅速蔓延。

我们沉溺在信息的海洋中，但要解决燃眉之急，我们需要的是沉思之甘露。

卡尔表示，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因此并非一成不变，但其变化通常是负面意义上的，可能会导致大脑行为模式的僵化。上

网会带来极富诱惑性的刺激，因此脑神经元会怂恿我们反复启动因上网而形成的脑回路。使用谷歌搜索、浏览脸书帖文时，我们得到的快速响应会刺激神经元释放某种物质，愉悦感由此而生。

而根据神经达尔文主义理论，那些原本用于针对长期个人体验以及文化、社会转型开展复杂立体思维的神经回路，因为总是派不上用场，就被无情地“剪除”掉了——当然，是以人类观察不到的方式。

神经学家诺曼·道伊奇写道：“倘若我们停止锻炼心智技能，那么这些技能便不仅仅会被忘记：它们在大脑中所占据的空间会被转交给我们经常使用的技能。”卡尔则一语中的：“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及其突触根本不在意思考品质的高低，因此智识衰退的可能性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

也就是说，人们一直捧着智能手机扫阅社交媒体、跟好友聊天，会使自己退化到无法明白气候变化和军备竞赛有多么危险——随着二月二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决定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经启动。没有多少人知道灾难即将降临，能跟亲友一道讨论这些会使我们万劫不复的新局势的，更是寥寥无几。

卡尔的解释如下：“由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家和网页设计师所开展的多项研究，其结果均指向同一个结论：上网时，我们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倾向于进行粗略阅读、匆忙思考、浅表学习，还经常分心走神。倒不是说上网的人无法深思——读书的人也有浅思辄止的时候，但网络科技本就不是为启发、引导沉思而存在的。”

倘若所有人都沉溺于“浅表”，沉迷于大脑神经元因眼前信息得以快速处理而产生的瞬时兴奋，那么能够理解我们面对着何种危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以致消失？至于培养能够提出对策并加以倡导的人，是不是更加无从谈起？

病态背后之“病”

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那一小撮贪婪无比的亿万富翁

既然连全人类的生死存亡都可以弃之不顾，那么要说他们会对现状肩负责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扯掉眼前的一切伪装，让目光穿过所有表象，我们会不会发现科技已经成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没错，为超级富豪们吹响笛子，让他们代领我们走向末日的，不是可怕的怪兽，而是一种终极之病——全世界通过网络连结在一起的几万台超级计算机。它们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算计如何将利润最大化，并将各种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位数。

摩根大通、高盛、巴克莱和美国银行让这些超级计算机来做最终决定，因为它们能够做人类做不了的事：估算整个地球的货币价值，严格按照指定算法榨取利润，且不会感觉良心上过不去。

投资银行背后大批的超级计算机在寻求终极暴利时，就连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亚马逊的奠基者杰夫·贝索斯在它们那里都不过是碍事的附属品。

我们恐怕不等超级计算机进化出思想便会迎来人类文明失控的那一天。按照人们的需要，计算机只是根据潜在利润的多寡来确定各种社会因素孰轻孰重，而不把生态系统乃至人类本身纳入考虑。超级计算机背后有一种“意志”——大体说来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它们早已被物理学定律植入程序，注定要制造更为严重的混乱。各位可能会深感疑惑，人们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让这“终极病号”来代替自己做决定。

如果说社交网络、视频和游戏能够改造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令其常常在多巴胺的刺激下开展应景式思维，那么计算机哪怕无法思考，也能，且只能接管这个世界。

人类尚未完全失去理智，但我们令超级计算机从事着邪恶勾当却掉以轻心。在这片土地上，懵懵懂懂我们正在被一个愚昧无知的超级盲人引向绝境。

2019年3月26日

终止美国的“特有制度”摒弃致命的矿物燃料

如今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为首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正在大力呼吁实施“绿色新政”，称此举可以促成经济转型，让美国以及整个地球的发展模式更加契合环保理念，这番新气象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特朗普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矿物燃料的使用，奥巴马政府也支持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矿藏，与之相比，上述观念显然更为进步。然而，倘若我们用科学方法对美国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加以评估，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让人们大失所望：很可惜，所谓“绿色新政”有些言过其实，不足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当然，进步媒体已经告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政坛与媒体界已经被石油巨头所染指，然而这番警告对扭曲的经济体制几乎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我们身处其中，受其所迫，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塑料、石油和煤炭。我们时常懵懵懂懂地听着关于未来灾难的不详预言，模模糊糊地知道北极熊的生存状态有多么悲惨。要想改变现状，除了等待下次大选、不再使用一次性杯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美国得了重病，我们无法再对它的病症视而不见。就好像吃下了变质的食物，肚子疼可以忍，但最终还是要靠呕吐来把有害的东西排出体外。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明白尽管“绿色新政”的宣传照片光鲜亮丽，但新政的宗旨并不是立即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更不是让民众主动接受可再生能源。新政中的漏洞大到足以通过一艘超级油轮，然而娜奥米·沃尔夫对其提出质疑之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谁认真地对她加以驳斥。倘若我们继续沿用现行体制，就会为大企业和投资银行利用法律挪用资金乃至开展危险的地球工程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民主党战友仍旧依赖大企业来获取资金（就算不是直接收受，也是通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拒绝同更加进取的组织合作，因为后者不对民主党亦步亦趋。

然而另有组织做出了政治回应。我们见到反灭绝抗争团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发起了抗议，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有坚定立场，认为当前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无法支持人们开展活动、追求真相的政治体制一无是处。

反灭绝抗争团着眼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以及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将人类灭绝做为其全球性活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会给政客溜须拍马，也不会跟大企业CEO和说客谈天说地。反灭绝抗争这一政治运动并不会因为顾忌观众的心情而低调，也不会根据财团媒体的要求来调整信息发布口径。

反灭绝抗争团的首要任务是让高碳经济体系立即停止运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让全球的大城市陷入停滞状态。

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在六年之内实现零碳排放，其途径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树立新型文化，从而大幅降低消耗，彻底转变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将这样的政策变化称为革命毫不夸张。

反灭绝抗争团与懦弱无能的民主党不同；他们在其名为“真相”的网页上毫不避讳地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海洋、森林、南极、北极以及人类自己正在遭受摧残；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尽管很多人认为反灭绝抗争团的做法过为极端，但实际上，反灭绝抗争是人们迄今为止发起的唯一一种以科学实证（而不是臆测观点）为基础、以推行某种政策为宗旨的大型理性政治运动。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败，随着政客、知识分子和名为“媒体”的可悲机构对残酷现实避而不谈，将迫在眉睫的灾难轻描淡写、称之为“气候变化”，反灭绝抗争愈发合情合理。

其实反灭绝抗争团发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响起的声音：这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费型经济兴起便浸泡在石油中的文

化，必须予以终止。

我们中间没有无辜之人。我们每次打开Email、洗热水澡、开车去超市、乘飞机去拜访亲友，都在人类之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棺材上钉下了一枚钉子，更不用说不计其数、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其他物种已经难逃灭绝的命运。

美国的“特有制度”

我们要努力正视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舍却“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挖掘真相”（Truthout）等媒体以及罗伯特·赖克等满嘴谎言的知识界人士所大肆鼓吹的“进步”方法——赖克根本不承认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危机。

我们要明白，被进步人士普遍视为重大突破、被愚昧的特朗普弃如敝屣的《巴黎协定》，其签订不过是保留彼此面子的政治策略，目的并不在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要想生存，我们就必须立即实现矿物燃料的零使用，不能再等到2030年，慢慢地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到40%。在此紧要关头，出资支持“进步”运动，等待下一次大选，无异于自杀。

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终结这种消费文化，颠覆认为生产、消费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想法，明确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会对地球产生直接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年轻人远离从矿物燃料经济获益的银行和财团的误导，不要让他们接受碳交易、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开展地球工程、开发新生代核能等危险的折中手段。

既然美国各方（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企业、非政府团体和教育组织）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那么民众就应当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大家曾寄予厚望的看门犬已经变成了哈巴狗，只顾吸金，根本无法与矿物燃料巨头较量——不论他们的花言巧语有多么动听。

我们必须亲自参与国家治理。

350.ORG是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相关资讯。该组织于2019年4月23日向其成员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于周五做出了大胆的气候承诺：如若当选，她将在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禁止一切公有土地上的矿物燃料开采活动。”

350.ORG称赞沃伦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比起其他总统候选人来，沃伦似乎领先一步，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种族来讲，她的承诺未免太过苍白无力。

禁止公有土地上的开采活动？其言外之意相当明显：我们应当要求不支持这一政策的候选人立即退出竞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永远禁止美国全境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开采活动。或许这种提法更具实质意义和说服力：一年之内让使用石油这一行为非法化。

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损害臭氧层的氟氯碳化物的使用做出了广泛管制；这一先例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借鉴。我们需要签订禁止使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伦敦议定书》，因为它们的生产 and 消耗都会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此种由各国共同担责的国际性协议意义重大，签署此类协定是让全世界停止使用矿物燃料发电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是，我们正在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保守派对峙，他们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必须逐渐通过政治过程予以压制。

然而事实是，与我们对峙的并非“保守派”，而是大批罪行累累的企业——它们掌控着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正在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搞破坏；能够规范其行为的机构已经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的痴迷令我们无法摆脱矿物燃料，更让这种依赖性根深蒂固——与这一现象形成类比的是美国在19世纪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有损道义的奴隶制。

奴隶制通过不加限制地剥削无偿劳工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

南方种植园主的收益，而北方的银行借南向投资也分得了一杯羹。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似乎为制造业和种植业提供了廉价动力，但其隐形代价其实相当可怕。

身为“奴隶”的非裔人种的人文素质被名不副实的法律系统所压制——在“证实”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伪科学的支撑下，当时的法律系统更加牢不可破。奴隶制玷污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以罪恶为基础、视犯罪为本国特有文化的社会。然而南方各州的上流社会家庭均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

当时人们将如此可怕的体制尊为“特有制度”，似乎在暗示美国南方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习俗。然而创造这样的名头不过是掩耳盗铃，其背后仍然是没有健康社会予以支撑、崇尚剥削的罪恶体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废奴主义者）为阻止奴隶制扩散至新加入美国的各州而奋力抗争；他们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奴隶的境遇，并且允许逃出蓄奴州的奴隶自由地生活。然而大多数改良派废奴主义者的基本想法都是：拥护奴隶制是恶政，需要慢慢将其改变。

与之相似的是，当前美国的政治讨论都纠结于如何普及风能与太阳能、如何使可再生能源更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终止特朗普政府补贴煤矿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苛以重税的极端政策。

但只有在无视以下事实时，类似的政治讨论才有意义：矿物燃料企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犯罪来让我们保持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矿物能源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损害环境，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换言之，上述观点只是自欺欺人。

支持使用矿物燃料的说客和政客，以及因开采石油煤炭而暴富的CEO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的政治讨论格局并无异议。他们因利丧德，共同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不惜为追逐利润而毁灭我们的地球。

反灭绝抗争团就是要将经济体制掌控在自己手中，舍弃中间

人——以撰文为生的受教育人群。正是这群人鼓吹长期的“进步”措施，怂恿国会议员利用不温不火的提案来取悦企业、获得资助。他们说风能可以与燃煤相媲美，还将联合国报告中提到的生态崩溃作淡化处理，其目的还是保证他们的研究机构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某些组织的献金，而这些组织的背后就是依赖矿物燃料获利的财团和银行。

我们的约翰·布朗时刻

如果要从历史上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寻找出某一重要时刻，借之以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反灭绝抗争、反对矿物燃料的使用，最贴切的例子当属约翰·布朗及其追随者发动的起义。反灭绝抗争团要为摒弃矿物燃料、阻止人类灭绝而摆脱“进步措施”的桎梏，正如约翰·布朗等人宣布败坏道德、推行奴隶制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在约翰·布朗发动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南部还有许多人称他为叛军首领，污蔑他是叛国贼、是疯子。但只要读一读布朗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有完美的逻辑和深刻的道德信念作为支撑。布朗于1859年10月突袭弗吉尼亚州哈伯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时，其意图便是通过建立新政府、抛弃腐朽的经济体系来终止奴隶制。他的起义军很快遭到镇压，他本人也因叛国罪（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该罪名）而被处以绞刑。

通过奴隶制谋利的群体（民主党）指责布朗卑鄙无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北方的进步人士（共和党）大多隔岸观火，表示不插手蓄奴州的“家务事”。

我们还是看一看布朗起草的《临时宪法条例》吧：

“由奴隶制引发的矛盾堪比自美国诞生以来其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其所导致的要么是无休无止的监禁和令人绝望的奴役，要么是彻彻底底的人种灭绝，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

享有白人尊重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

这段话稍经改动，就可以与危机重重的眼下，以及我们对石油和煤炭极度依赖的状况相契合。

“在是否使用矿物燃料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堪比民众之间最野蛮、荒唐、畸形的内斗，最终将导致地球沦为炼狱，让人类永陷水深火热，直至灭亡；这与美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颠扑不破、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身为美国公民以及深受压迫、近日根据最高法院裁决无权拒绝矿物燃料产业的人们，连同其他因为相关法律而人格受辱的人们，于此时制定颁布以下《临时宪法条例》，以捍卫我们的同胞、财产、生命与自由，规范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免受由矿物燃料经济招致的灭顶之灾。”

这两段话蕴含的道德理念完全一致。

反灭绝抗争团与布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采用的是非暴力方式；但反灭绝抗争与布朗起义之间的类比仍不牵强，因为前者的参与人员一旦行动，就会面临入狱、受暴甚至死亡的危险。

扭转乾坤，抗击制度化犯罪

与民主党不同，反灭绝抗争团要求各种问题得到切实解决，而前者只会提几条不痛不痒、肤浅粗陋的改革方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保守”观念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与之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反灭绝抗争反映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时提出的告诫：“民众不提出要求，权力便不会退步，过去也好，未来也罢，都是如此。只要弄清楚民众可以默默地承受什么，就能搞明白可以用何种手段来盘剥和欺凌他们，直到他们用行动、言语予以反抗——有时还需要二者并用。”

道格拉斯的话说明，一味地就矿物燃料的长期负面效应做抽

象阐述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具体的要求，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坚持立即废除当前罪恶的、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能源体系。

约翰·布朗提出奴隶制并非“特有制度”，保留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行径，是对某个群体“开战”，从而改写了游戏规则。同样，我们也应当掌握能源领域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关键术语。碳排放并不是能靠交易解决的小小流弊，而是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

换言之，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右翼分子犯下的暴行，而是主动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普及当下急需采用的文化和经济制度。我们既不能依靠比尔·盖茨等深陷现行经济体制的富豪，也不能仰赖曾长时间支持通过矿物燃料谋利的民主党人；我们不能看见有人做出一星半点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就心满意足。

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客数不胜数，他们在委员会上发言，否认气候变化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宣称气候变化并非确有其事。他们从矿物燃料产业捞得好处，经常让科氏工业等石油巨头豢养的“专家”现身说法，证明矿物燃料完全无害。这些“专家”在研究活动中造假，公然挑衅科学事实。

目前，进步政坛人士正在埋怨“保守派”政客无知、自私、短视，嘲笑他们的专家和拥趸“愚蠢至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党人的主张不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是限制南方各州的蓄奴规模，他们的态度简直与当今的进步政坛人士如出一辙。

气候变化不是一种观点，而是科学事实；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也不是利益调整，而是法律。

那么法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法律规定相当明确。倘若某议员亲自、或请专家在委员会上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不具危险性的证言，那么此举并非表达保守观点，而是做假证。根据法律，这一行为已构成重罪；涉事议员要么会被迫辞职，要么会面临牢狱之灾，作伪证的专家也会落得同样下场。

从逻辑与合法性两方面来讲，上述论断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议员和专家证人在国会山明目张胆地犯罪时，却没有一名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对其提出指控。罪行就是罪行，不会因为持续了几十年而变成合法行为，正如奴隶制即使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仍然有损道义。

倘若没有国会议员、行业律师、说客、咨询公司和咨询人员愿意秉持公正、合法的立场，那么民众就应当挺身而出，要求上述犯罪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要求犯罪者不能再踏入国会。抗议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客们便会在重压之下做出改变。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采取如此强硬的路线无异于逼迫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和游说人士离岗入狱。然而，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即使诉诸于这样的方案，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倘若情势要求我们对数不胜数的民主党人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决不会退缩。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全部国会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嫌犯罪，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要求他们通通下台，要求自行组织选举，不受任何同罪恶矿物燃料产业有所关联的组织干涉。

现在国会议员从矿物燃料企业和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处收取献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鼓励使用矿物燃料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就连政府都为炼油厂和公路系统提供补贴，但这一切不属于民主过程，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通过前台组织运营，购买或者拆毁公交系统，要么是为了提升民众对石油这种危险化合物的依赖度，要么是为了重组美国军队，让其植根于石油，并为此而保障石油供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一系列政策决策的罪恶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等石油提供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完全明白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他们的有害产品正在荼毒环境——或许还要更早一些。他们对人类眼前的重大危机心知肚明，但还是将调查结果秘而不宣，并雇佣专家和公

共关系公司通过发布广告、篡改研究结果和游说向公众发布误导性的虚假信息。然而进步民主党人只能责备这些企业自私自利，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捐款，支持他们参加下一次、下下一次竞选。

请问问自己，如果你销售的产品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夺去了全球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生命，更会导致全球变暖，令几千万人惨死，你会有何下场？如果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自己产品的危险性，非但将实情瞒而不报，反而用脏钱贿赂政客、收买冒牌专家，让他们对国会撒谎、为你的犯罪行为辩护，你又会怎样？

毫无疑问，你将遭受阴谋罪指控，立即被捕入狱，你的资产也会被尽悉没收。你会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付出比所得多得多的惨重代价。

那么当矿物燃料企业及其背后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如此明知故犯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同样，民众也该要求将上述企业做为犯罪组织看待，剥夺它们利用不义之财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责任方应该立即入狱，为他们四十年以来犯下的罪行遭受指控，为虎作伥的政客和说客也当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工业等企业的资产，以及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应当全部充公，用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赔偿全世界的受害者。

无需考虑矿物燃料企业应当出资多少来支持“保守派”代表参选，也不用琢磨较为强硬的“进步派”在如此不公的政治环境中赢得大选需要多少钱。一旦矿物燃料企业的资产充公，一旦受其雇佣、助纣为虐的说客和专家被挡在政坛大门之外（正如昔日南方军的领导人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内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共识和宪法制定切实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大批政客已经被矿物燃料公司、银行和与矿物燃料企业狼狈为奸的富豪收买。我们有权力、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向国会提交证言、参与政治过程；在许多场合下，我们还应当要求他们立即

辞职。参与大规模造假的智库研究员、教授、律师、说客和其他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区别对待。

政治辩论必须以科学发现而非主观想法为基础。在我们的默许下，企业像某些人一样享受各种特权，关于气候的虚假言论因为有财团的支持，被奉为金玉良言。这一切都应当到此为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能够清楚地表达逻辑观点的人只有一小群，他们也可以在美国掀起思想转变的潮流。然而，倘若不把追求真理做为基本政治原则，民主便会沦为闹剧。

但我们的任务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声讨广告，将发布广告视为犯罪，因为美国民众在广告的误导下低估了工业社会的危害，尤其对汽车、飞机和基于煤炭与天然气的工业生产对环境 and 人身造成的不良影响置若罔闻。

企业用广告贿赂媒体，使其无法发挥公布真相这一重要作用。在需要动员群众的紧要关头，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把新闻变成了供人娱乐、可有可无的消遣，让大家无法把目光放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上。只要商业媒体还在给民众灌输经过篡改和扭曲的讯息，后者就无法做出客观决定，民主政治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广告文化。它粉饰太平，暗示人们拥有汽车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它不鼓励精诚合作，反倒宣扬自私与及时行乐。我们要通过自办报纸、在公共场合做宣讲等直接手段来向民众准确解释气候灾害为什么会毁灭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还要认识到，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念分歧，而是当权者的愚民之策——人民愚昧无知，就察觉不到眼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也无法想出应对之计。

我们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由政府资助，补助金源于税收，其分拨必须透明化。以利己为目的、议程不明的所谓“研究”必须从政府及民众的政策讨论中消失。这一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应当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明白人类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威胁——我们要保证他们不会因沉迷于电子游戏、娱乐视频和色情图片而对周围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

同“自由贸易”、“军事安全”等虚假观念较量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性运动披露的是残酷的真相，而不是令“进步媒体”心安神泰的有限讯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同政客们远而避之的两只巨型怪兽较量，它们一个名为自由贸易，一个叫做军事安全。

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通商对美国国民乃至整个世界有益，因此应当不断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我们财源滚滚。

如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企业就可以把工厂迁至国外，同时拿关闭工厂来威胁当地工人和社区，以获得政府补贴。海外工厂为美国供应廉价产品的同时，也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环境，还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良影响。每一个宝丽龙泡沫盒子，每一件尼龙套衫，每一套塑料玩具，不仅会在被丢弃后毒害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而且其生产过程也会给气候带来负面作用——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地远在印度或者泰国。

自由贸易控制了我们的经济，逼迫我们购买在海外生产（常常会以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为代价）、再耗费大量矿物燃料运来美国的产品。生产一次性物品时造成的污染，对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工厂在哪个国家而改变；而且经过几千公里越过重洋运输商品时，又会排放大量尾气。然而就连左翼组织都对自由贸易的这一可怕后果避而不谈。

同时，进步及左派刊物已经接受了“GDP”、“消费”、“增长”、“发展”等极其片面的经济指标，至于它们没有反映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影响，没有涵盖土壤、水源和空气的长期恶化这一缺陷，知识分子却甚少提及。尽管有人曾经提议

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但类似提案并未被纳入议程，更不用说投入使用。

美国国内经济与矿物燃料的勘探、生产和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军方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军方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污染制造者，其对气候变化应负的责任比许多国家都大。

美国军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在全球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基地。在许多情况下，其主要任务已经变为推动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的开采，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做法会对气候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军队与“国防”和“安全”毫无关联。

除非军队的作用发生彻底转变，否则美国不可能采用贴近实际的气候政策，而这种转变必须以改变“安全”的定义为前提——要把减缓气候变化做为实现安全的第一要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考虑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实现上述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抛下武器，但在与矿物燃料巨头对抗时，却又离不开战士们的勇气和自律。凭借独特的创意和非凡的勇气，我们可以令美国军队脱胎换骨，令其角色和本质发生彻底转变，让它将气候变化视为首要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国防部重组为“人类安全事务部”乃至“气候变化应对部”，通过周密的计划取消不正当的军火开支。以此为目标，究竟是开展体制改革，还是推翻现行制度重新开始，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决定。

近日来“革命”一词在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已经变为空洞的口号。

然而美国立法者并未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拟定长期国家政策，这说明美国政坛已经深陷臆想与错觉。

根据气候恶化趋势方面的科学预测，未来我们将没有财力添置战斗机、航空母舰，甚至高速公路和体育馆。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曾提出应当像在二战中一样调配资源，而为了平

安渡过气候变化危机，我们恐怕要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各种资源。

可悲的是，美国目前的确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然而却是反面意义的变革。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各部门中的专家人才惨遭驱逐，有责任感的正义人士要含冤受辱。他迅速将政府职能私有化，让政府沦为精英阶层敛财的工具，不再为普通公民服务。

我们无暇讨论革命性转变的“正面意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革命性新政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加税、发放煤炭和石油补贴，以及将科学方面的考量剔除出政策制定过程。

等到下次大选、退而求其次、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发表敷衍声明的民主党代表——此类提议毫无意义。一场反动的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

2019年6月4日



重新考虑东北亚的真正危机

美国如今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着不折不扣的灾难，这完全是其咎由自取：它轻率地对华发起贸易战、坐视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税战，同时竭力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令多方为合作交流付出的广泛努力付之东流。在我们默默的注视之下，善意的“不干涉”政策转变为恶意的无视。亚洲人或许会对此缄口不言，但“美国是破坏性力量”这一观点正在他们之中迅速传播。

“推特（Twitter）治国”以及“国际社会要以特朗普为先”的崭新观念反映出人们对眼前利益愈发重视，而正是这一趋势埋葬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美国拥有自由女神像，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也曾全力支持为解决核扩散、贸易和恐怖主义问题而制定的全球性条约——这些都是其国际主义传统的象征和体现。

东北亚危机的源头并非平壤，而是华盛顿——华盛顿的贪婪和自大在亚洲的首都城市找到了新的宿主。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在亚洲掀起新一轮“冷战”？要知道，美国或许非但无法借之以挽回失去的威望，反而会被抛出该区域。

日本也已将韩国视为假想敌，预测可能会与其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必须即刻探索新的途径，避免军备竞赛的发动，阻止韩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否则可怕到难以想象的噩梦就会降临。所谓“新的途径”内涵甚广，改变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言之无物的峰会还是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都无法解决东北亚危机。我们需要放眼东北亚的未来，助其开展变革，令其踏上光明之路。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徠曾写道，世界上有两种棋艺大师：一种通晓规则，赢遍天下而不费吹灰之力；另一种则能够自己制定规

则。

对于我们来讲，后者颇为陌生。我们已经习惯于维持二战结束后确立的世界秩序，从未尝试过破旧立新。但我们在东亚逐渐瓦解的地位无法通过缓慢的变革来挽救，我们必须彻底转变美国在亚洲担当的角色。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只要放弃以妖魔化别国为条件，答案就会跃然而出。

世界正在深受气候危机的困扰——瑞典女孩葛莉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感人至深的演讲将这一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无数心怀热忱的年轻人都曾呼吁为了让人类免遭气候灾难之害而彻底改变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他们知道，倘若坐视不理，承受可怕后果的将是他们自己。

他们改变世界的诉求为美国重新定义自己在东北亚的角色，为解决中美之间的对抗，为鼓励日韩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宝贵的机遇。

美国必须认识到，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沙漠蔓延、热带风暴肆虐——不论气候发生何种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便是东北亚地区面临到重大威胁。许多人正在垂死挣扎，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几年内死于非命。

然而要实现上述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彻底调整自己的观念，而这正是葛莉塔所呼吁的。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把关注点从军事，从战斗机、军舰、子弹和导弹上移开，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使命，令国家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重新造林，保护海洋、河流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尽管军队是主要的污染源，但还是可以将其加以规范，使其为清理污染以及推行石油开采、煤炭使用的禁令贡献力量。

这样的愿景似乎太过异想天开，无法实现。然而气候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全盘重新考虑。

以东亚问题为例，倘若美国能将目标从发动常规战争转移到遏制气候变化（植树、保护生态系统、防止企业为谋利而破坏地

球上的宝贵资源)，我们就会发现，美、日、韩三国的军方其实可以在多个领域通力合作。倘若中美两国的军方都能关注如何适应、缓解气候变化，双方的合作根本无需多加考虑。

设立军队的初衷并非达成上述目的，其所秉持的安全与国防观念未免已经不合时宜。然而，倘若军方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其实现上述转变的效率将比行政部门高得多。

军方可以不计收益地制定长期预算、用以发展科技，可以规定全国一律使用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时限并坚决执行。我们应当集中美、日、韩三国的经验与技术，研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军事扩张。

2019年10月8日

空前危机下联合国急需根本性转型

联合国于1942年建立。当时在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推动下，极权主义盛行全球，全人类面临被拖入野蛮时代的威胁。一小群知识分子与政坛活跃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极权主义，主张国际主义与世界和平。他们同苏联、中国、美国 and 英国的有识之士，以及被迫流亡居住于伦敦、华盛顿和上海的其他国家政要并肩作战，为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开创性规划和实施而呕心沥血。

欧、亚两洲反法西斯主义者所拥有的智慧与经验，以及少数政坛领袖手中的制度性权力暂时合流，为建立令人鼓舞、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下基础。

联合国的诞生，可追溯至1899年、1907年和1914年的三次海牙和平会议。这三次会议致力于建立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1914年的和平会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止。三次会议确立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施了裁军方案，针对战争行为发布了涵盖战争罪行惩罚措施的人道主义法律。当时所确立的传统在今天仍至关重要。

美国因在二战中取胜而自鸣得意，将联合国操控于股掌之间。可悲的是，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无法拒绝接手大英帝国战利品的诱惑，从而不必要地将苏联变成了敌手而非共建世界和平的伙伴。

然而，即使联合国并没有在冷战时期发挥潜力，但在化解危机、采取措施解决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方面，仍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使在布什总统任期内，联合国的预算被削减致最低限度，即使美国的多项战略将联合国决议视为无物，即使美国的政策与国际法渐行渐远，联合国仍然被全世界人民视为可借之呼吁公平正义、寻求正确引导的重要机构。

与维持众多非公开、利己性的世界秩序操控制度相比，人们更希望建立可靠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份强烈的意愿足以在最为艰难的时刻推动联合国继续行进。然而美国却再也没有重拾自己在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所履行的制度方面的承诺。

如今，2018年，我们发现自己又处在了一个充满重大危机的时代，随着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治理体系的崩溃、价值观念的瓦解、财富的集中、种族主义政治运动的抬头以及军国主义的大肆叫嚣，种种威胁接踵而至。与1942年联合国诞生之时相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其危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军入侵苏联、日本入侵中国之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惨遭屠戮，那场悲剧我们并没有亲眼目睹。然而，美国决意废除所有军控条约，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发动侵略战争，这或许预示一场同样惨烈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美国正在经历军控政策系统的灾难性崩溃，且其外交政策处于夸夸其谈的理论家、精神病患者约翰·博尔顿的掌控之下，也许足以吞噬全人类的地狱之门已经大敞四开。如今，美国似乎又撤回了驻联合国大使——或许再也不会派出下一位。

而且，人类此刻面临的风险比以往高得多。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大量核武器，其威力比在1945年将广岛和长崎化为焦土的原子弹大几千倍。其余国家中，也有许多掌握着核武器与其他破坏性巨大的军械。更有许多国家，只要政治风向有所变化，即可在短短几个月内大批量地生产出各种军火。

满腹军国主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一位法西斯“基督教”领导人——威胁对华开战，这表明全面战争不只是电子游戏中待人们去体验的虚拟剧情，更是在美国的政策推动下很可能会上演的现实。倘若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都毫不畏惧，继续为推动煤炭石油业的发展而一掷千金，那么各位有何理由认为他们会害怕发生核战争？

军国主义并不是我们面前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威胁。财富集中这一世界性问题正在愈演愈烈，而且情况还会愈加恶化。它使各国文化发生了全方面扭曲，而且因为精英团体意图为所欲为，治理体系也已面目全非。《2018年全球超级财富报

告》显示，目前大约255,810名“超高净值人士”（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人）控制了31.5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一数值远远超出全球80%的人口——56亿人——所拥有的资产。从2016年至2017年，超高净值人士的财富增长了16.3%——2018年财富报告披露上述数据时，该人群的财富增长率很可能已不止于此。

人们应当在此刻——而不是未来——做出选择。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可能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我们曾经深信不疑会引导全人类奋勇向前的全球自由秩序业已分崩离析，留下的只有浓烟滚滚的弹坑，任由投资银行家及其拥趸同怀恨在心的法西斯主义崇拜者们在其中展开唇枪舌战。

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世界所需要的，恰恰是全球的切实回应。目前联合国能力有限，因此我们应当另建体系，创立一种全球性系统，借以针对人类所面对的威胁之缘由开展科学理性的分析，让整个地球做出迅速而又有效的大规模响应，不论国界。

联合国需要的不是改进，而是转型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人们为改进联合国现有体系而提出的建议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千年发展目标”等已经部分落实的提案。但是由于全球投资银行与主权财富基金对联合国的控制程度日趋加深，大多数提议都已被束之高阁。

此时此刻，改进联合国的现有体系已经不像给铜器抛光、给地板打蜡那样简单——为时已晚，腐蚀已深。至于联合国的任务指派模式，我们或将其视为官僚特权的体现，或将其看作政策制订过程的商业化与私有化结果——不论怎样，联合国都已失去它应有的能力，无法胜任阻止世界战争、恶性财富集中以及全球灾难性变暖的使命。实际上，比起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的那个年代，现在的联合国更加力不从心。

地球议会

与其列出一份联合国亟待改进事项的细目清单，不如进行结构性转型，使联合国功能发生彻底改变，恢复本来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使联合国真正处于能够为地球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地位上。

我们应当将联合国转化为两院代议制机构——大体上与美国国会或英国议会类似。

现有的联合国大会应变为新机构中的上院——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上院可保留“联合国”之名，各国均在其中指派一名代表。此外，现有的安全理事会应由经选举产生的发言人以及经济、安全、福祉和环境问题委员会代替。

目前负责全球治理事务的主要部门应当转变为全新的立法机构，其职能与下院或“众议院”粗略近似——其实这个比方并不确切，因为这种新型“下院”将远远超越联合国现有相应机构以及许多国家的国民大会：后两者处理事务的流程多是不对外开放、非参与性的。

这一机构——暂且将其称为“地球议会”——将代表各个地区地球公民的需要和关注点来履行职责，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制订、实施各项政策的全球性机关。

地球议会将在与全世界民众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放眼全球，制订全球性政策。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履行过类似的职责，但地球议会还将更进一步，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成果，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多年以来，人们曾为实现名副其实、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提出过许多建议，但我们通过各大科研机构的调研结果发现，国际关系话语已遭受严重扭曲，因此那些提议中的绝大多数无法变为现实。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坚持探寻意味深远、有大国做后盾的提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在本质上与我们所说的“地球议会”最为接近。习主席的这一提法也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揭示全人类需要同心协力、开启全新的全球视角，以此来应对时代的挑战。

地球议会绝不能由国际投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或其他充当超级富豪手中工具的机构来控制。它应当在制订全球政策的同时，直接代表地方群体的利益。地球议会将开展科普，让普通大众得以了解地球真正的需要、环境的真实本质以及人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付出的努力。缺少教化的治理堪为暴政，而地球议会将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此类教育。

地球议会还将推动全世界民众在真正的分享型经济框架内开展合作。营利性组织及只关注短期利益的个人同地球议会之间的互动将受到极大限制。尽管人类天性难以改变，但我们应该尽力在议会内传播奉献精神，使其着眼于长期利益，甘于无私服务，从源头杜绝利益冲突。

政策将在地球议会内部制订，法律事务所、智库、咨询公司与其他缺乏透明度的腐败机构不得插手。地球议会受全球民众捐赠，拒绝任何形式的可疑资助。控制预算规模，能够做出准确、客观的决策，要比拥有催生腐败与危险政策的大笔资金好得多。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立法机构，地球议会将根据世界总人口来决定代表人数。或许可为每五千万人指定一名代表，那么六十亿人就有120位代表。委任代表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如非洲的人口）。与此同时，身为地球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因在当地人数较少而无法在其政府中拥有直接代表的群体，如极端贫困者、有生理缺陷者等，在地球议会中也应有人替他们发声，即使此类人在一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地球议会将根据科学原则对全人类以及地球的长期利益展开评估，并将国界与个别群体利益等问题放在一边，从而针对当前挑战提出应对方案，并将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实施。地球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其解决方案应当立足长远（至少三十年）。此外，针对气候变化等安全问题，地球议会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开展深度讨论。议会还将建立全球融资框架，让所有地球公民都能承担得起使用太阳能和风能，以及有机耕作方式的经济负担。

针对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纠纷，地球议会将

不再遵循只关注眼前的仲裁原则，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综合性方法，把人类前途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尤其把地球的生态健康纳入考虑。

如今，拯救处于垂死状态的海洋、减少有害化学物质的排放、控制沙漠的蔓延、停止危险武器的大量生产等问题已不再被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严肃对待，大批精英也已完全脱离普通民众。因此地球议会将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职责，告诉他们人类在这个时代中所面临的真正威胁，鼓励他们就上述问题开展讨论与辩论，协助他们采取措施开展跨越地域的合作，切实改变现状。

地球议会关注的是地球本身。对它来讲，所谓“安全”是指让地球以及居于其上的生灵——不只是人类，还有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受到保护，否则人类将没有未来。地球议会既不代表跨国企业，也不受由腐败堕落、欺诈成性的媒体所放大的民粹主义言论操控。它将集中物力财力，援助致力于追求真相、坚守正义、身体力行解决问题的基层地球公民。

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关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提议没有半分理想主义色彩。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是否有所了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治理”观念压倒“民族国家”概念的时代终将到来。摆在我们面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汲取传统道德哲学的精华，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孜孜不倦，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以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应对难以预料的挑战。

中美贸易战：远离战争边缘

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将在大阪G20峰会后的两周内决定是否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在此之前，已有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进入加征关税清单。特朗普在自己《交易的艺术》一书中所陈述的高压策略再次上演。他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会场外冷面相对后，中国能做出更大的让步；要是中国能不经双方交涉就主动妥协更好。

然而中国并不会如他所愿。

特朗普上述冲动决定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尤其令中美关系前景堪忧。

唐纳德·特朗普正在遵循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的建议，一厢情愿地向中国，以及墨西哥、德国和法国漫天要价。他已经做出尝试，在没有按既定规则开展协商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加征关税等惩罚性措施——其中还包括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下达禁令。

美国宪法中有“贸易条款”，明确规定国会有权力“管理美国与他国之间、国内各州间，以及有印第安部落参与的商业行为”。自从2002年起，贸易促进授权法案（1974年总统快速审批权法案的升级版）又赋予了总统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权力，规定国会可就贸易协定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但无权予以修改。

二十年以来，总统的“快速审批权”已经成为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因素，美国的权力平衡机制与宪法的权威性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

尽管行政当局篡夺贸易权力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本届总统还是在某一方面开创了先河：他公然把立法机构排除于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之外，更将经济学家的主张和民众的意愿置若罔闻。这

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在一小撮人的掌控之中。

报纸甚少提及国会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就好像平时参与制定贸易政策的各种国会委员会都成了摆设。

整个过程中缺少多边机构根据惯例和国际法为解决贸易问题而开展的政策讨论，这同样有悖常理。比如，为解决贸易与关税争端，各方于1993年形成了“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以及组织内的贸易专家曾在美国的贸易讨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美国政策至少在表面上尚与既定的全球准则相符，华盛顿甚至为世界树立了新的榜样。

特朗普得以对中国提出单方面要求，表明他已独揽贸易政策决定大权，哪还有部门和制度能够保证总统的贸易谈判权不会遭到滥用，保证贸易行为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

然而事态仍在恶化。现在特朗普把中国做出“详细、可执行的承诺”做为签署贸易协定的前提条件，言外之意，就是由美国判决中国是否符合协议规定。现在华盛顿上下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毕竟美国商务部去年便已对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下达出口禁令，因为该公司不顾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向这两个国家出口科技产品，遭处罚后又没有支付罚款。换言之，美国认为自己可以不经任何多边机构商讨便单方面决定对异己实施制裁和惩罚。

而这是中国所无法容忍的。

“中国不是犯人，也没有犯错，美国为什么总想监督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在近几日的采访中表示。“如果有监督组严密注视中国的一举一动——中兴已经有此遭遇，那么它最后瞄准的，肯定是中国的主权。我们决不能接受。”

中国对所谓“可执行的承诺”大为不满是有原因的。这一提法与美国对伊拉克、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制度别无二致；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军事入侵和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的兵力集结。而且美国在中国海岸线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愈发频繁，也给中美贸易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针对香港的政治游行事件发布评论，暗示加征关税可能很快会变为制裁手段——实施这样的制裁更不需要遵守国际准则。

随后，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美国军方又发表了《印度-太平洋战略书》，将台湾指称为“国家”，这是四十年来美国政府首次如此公然表态。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与美国签署协定，要求美方不得承认台湾为国家，且明确表示，倘若美国干涉台湾事务，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在这一系列摩擦和冲突的威胁下，中美之间的所有约定几乎要毁于一旦。

美国正在考虑终止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中国也在商酌针对美国限制稀土销售。生产导航系统、导弹传感器与高级战斗机，稀土不可或缺。据《亚洲时报》报道，以F-35战斗机为例，制造一架此型号的战斗机需要920磅钕铁硼磁铁和钐钴磁铁等稀土元素。

紧张态势迅速升级并非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记住：1940年，美国决定停止向日本出口废金属和铜，随后又于1941年8月1日对其实施石油贸易禁运，将贸易战升格成了真正的战争。

应当将贸易行为与安全问题区别对待，而且贸易政策并不是白宫中少数人的玩物。美国与中国需要针对气候变化、技术飞速换代、愈演愈烈的财富集中等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对话，以民众交流和学术会议为主导，开拓议题范围，让两国远离战争的边缘。

2019年6月27日

作者：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图片：金基道 (音译)



请看净做可笑错事的小丑总统！

无视门口的人！

美国应向中国学习，固守科学前沿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经济、技术整合，我们不能仅仅凭规模来衡量它的意义。未来十年里，在一带一路各项目上的投资预计将达几万亿美元。“一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目的在于实现以中国为起点、途经东南亚、延伸至中东和北非的物流通道及沿线港口的现代化，完成相关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升级。“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起源于古代，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了深刻的文化交流。

同时“一路”该战略还计划通过投资设计、建造及运营陆上交通走廊及新型基础设施加深中国同中亚、俄罗斯、中东和欧洲的联系，复兴在唐朝繁荣兴盛、充满传奇色彩的丝绸之路。

在一带一路战略得到大力推进的同时，美国地缘政治观念的孤立主义、偏执和对抗意味却愈发浓烈。目前该战略已有20个非洲参与国，且借向希腊投资、与意大利签订协议设立了进入欧洲的节点。

有人将其解读为中国为避免同美国及其东北亚盟国发生军事冲突时海运受阻而采取的防备策略。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的发起是一场阴谋，其目的是效仿欧洲人和美国人几十年的行径，将发展中国家推入债务陷阱。还有第三种解读：该战略只是为了通过拓展贸易、完善交通运输体系来疏解中国本身的过剩产能压力。

然而更有人担忧一个个规模巨大的开发项目——尤其是高速公路和矿物燃料发电厂的建设——会对环境和地球气候造成负面影响。

《自然》杂志近日来刊登了一系列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欧洲、南美和非洲为着眼点讨论一带一路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影响的文章。尽管目前这一新兴全球科研合作模式尚未成型，但其中心并非人们所熟知的西方精英研究机构，而且不以投资私企、获

取利润为最终目标。中国科学院领先一步，已经同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第三世界科学院展开合作，邀请来自一带一路参与国的200名专家定期来华学习研究。

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水质、交通运输和能源方面的科研项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有相当部分的资金流向了纯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公告已经成为了纳米技术等高精尖科学领域的重要信息源。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已与霍华德·休斯研究所共同研发出一种观察细胞活动的新方法；中科院已经开始寻求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植物标本馆建立合作关系，跟蒙古、以色列和哈萨克斯坦开启了防沙治沙项目，与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一起拟定了气候变化研究计划。其实气候变化一直是中科院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已同巴西合作，建立起天气学实验室，为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进行天气监测——这也是一带一路科研合作项目之一。

2018年11月4日，40个国家及国际研究机构共同建立起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对大规模科研活动展开监督。联盟明确表示，其宗旨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开拓“绿色的创新之路”。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提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疾病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的重点研究课题。至于商业利润、产品销售等问题，该联盟的声明中只字未提。更重要的是，尽管多方担忧一带一路的开发项目会导致能耗上升，但中国正在力求通过科学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今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如期举行，提出了打造“数字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宗旨是令亚洲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快捷便利。该项目包括开发北斗二号——中国独立开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预计该系统将在2020年建成，含有35颗卫星，可以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相匹敌；目前北斗系统已经得到了巴基斯坦、老挝和泰国的认可。

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将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分享卫

星数据，供环境监测使用。该合作项目要解决的八大问题是：适应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管理水资源，保障农业安全，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开展海洋管理，了解山区和北极的气候变化。

美国等国家已对数字一带一路提出批评，称该信息平台可能会通过人脸识别等信息获取技术用于国民监控。诚然，5G网络等新兴技术的确有遭到滥用的可能，但美国从未提议围绕信息使用问题建立国际协议，因此它的批评未免缺少底气。毫无疑问，中国在推动科学发展方面最强大的力量便是其遵守国际条约的自觉性，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政策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不再为基础科学的发展提供支持，而大规模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本就需要政府的稳定资助。特朗普执政以来，政府一直在与科学为敌。拒绝承认气候变化就是其蔑视科学方法的明证。

最近前农业部首席科学家盖尔·A·布坎南（Gale A.Buchanan）和凯瑟琳·E·沃特基（Catherine E.Woteki）联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对政府排斥科学的野蛮行径表示遗憾。农业部科研项目的预算遭到大幅削减，其主要的两个研究所也突然受命从华盛顿地区迁往偏远地带——关于此事的说明只有寥寥数句，众多科学家纷纷“主动离职”。

在国会的干涉下，美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的难度越来越大。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莱斯利（Chuck Grassley）甚至要求对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外国科学家进行严格审查；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预算已经削减了50亿美元。国家科学基金会已将自己的预算减少至71亿美元，削减幅度达12%；环境保护署的这两项数字分别为88亿美元和31%。虽然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预算只会被砍掉2%——特朗普一心想重启登月计划，但相关工程很可能会被外包出去，因此在实际科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投入很可能会缩水。

美国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不是对中国的言行采取何种态度，而

在于是否有能力挺立在科学前沿，固守未来技术的生命之泉。在特朗普缔造的黑暗时代，联邦政府寸步难行。让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得以实施的，并非某种特殊技术，而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没落。美国人民需要明白科学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需要虚心向中国学习。

2019年6月26日

美国的“文明冲突”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在被问及中美关系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伦·斯金纳表示，美国正在与“全然不同的文明抗争”，进而又补充道：“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高加索人种以外的强大对手。”

这番话并非无心之言，充斥其中的，是史蒂夫·班农奉行的种族本质主义。斯金纳提起冷战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地缘政治斗争，仿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类似冲突已变得无比可怕，将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她并不是在单纯地回忆往事；这番“与非高加索人种对手抗争”的言论，其实旨在再次兜售十九世纪席卷美国的“黄祸”之惧。当时的运动提出亚洲人会对美国文化造成威胁，从而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诞生，令来自中国的移民沦为非法居留者，也使东亚地区的移民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她还表示，中美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人权较量“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演”。她的话与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1年在参议院发布的无耻演讲遥相呼应：

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履行种族使命时、在世界文明中所担负的角色：我们是身受上帝托付之人……中国是我们天然的主顾。菲律宾是我们在东方世界门口的基地……曾有人指责我们的行为（美西战争）太过残酷。议员们，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议员们，请记住，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东方人。

斯金纳和班农对美国人的告诫同自由贸易原则乃至民主和法制纲领毫无关联，其背后不过是对一种无法同化的外来价值体系的排斥。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于5月14日在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通过演讲对斯金纳与史蒂夫班农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习主席并未直接谴责美国，而是指出中国乃至全体地球公民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他认为

人类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取得进步的，暗示人类经验中有超越西方后启蒙时代价值体系与方法的共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发展的快慢归因于文明的优劣。

习主席的话是否预示着某种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尚不清楚，但“平等对话”这个短语在他的演讲中出现多次，其暗含的深意是，在衣食住行、民生学术等各个方面，应当让多种文明持续交流的气象取代一种文明占绝对权威地位的局面。演讲中或许有空泛之词，但它确实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秩序提出了严肃批评。

习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列举了人类在建筑、绘画、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提到了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古印度诗集《梨俱吠陀》、阿拉伯短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

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在文明对话中起核心作用的三个必要条件，以及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条原则。

亚洲开展文明对话的三个条件是：使亚洲和平安定，令亚洲共同繁荣，让亚洲开放融通。

推进未来合作的四条原则是：1)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3) 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4)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特朗普团队从塞缪尔·亨廷顿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排外论述中汲取灵感，而习所提及的文明对话传统可追溯至列夫·托尔斯泰。文明交流方面的先例，有1974年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跨文化对话，也有科菲·安南将2001年宣布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这一举措。此外，土耳其和西班牙也于2005年倡议成立了联合国文明联盟。

习谈到了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有西学东渐。讨论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这篇演讲中可以找到毛泽东《矛盾论》的部分主张）。

我在中国参加过的会议中，有许多把中华文明奉为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有高低优劣之分。我曾经担心报纸和书籍会从中国消失，担心中国大城市的扩张会导致贪婪的消费型社会无限膨胀，担心工厂中的工人待遇太差，担心中央政府的权力愈发集中——这些也是全球趋势。

然而本次文明对话大会上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演讲、对国际视野（而不是全球视野）的公开呼吁，以及不同文明完全平等的提法，都可与美国的“文化冲突论”分庭抗礼——后者正在迅速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外言论。在北京听到的这几场演讲，令我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德莱·史蒂文森等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它们都内涵丰富、入木三分。在凭何理念可以拯救世界这一问题上，拉丁文谚语“*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似乎再次得到了验证。

2019年6月3日

脸书归何人所有？

我同朋友们说打算竞选美国总统时，他们告诉我，我的理念和宗旨十分崇高，但我应该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自己的想法，应该把履历放在搜索引擎上，让别人看得到——首选当属谷歌。

我明白劝我这样做的人心怀善意；尽管我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竞选资金实在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尽力而为。然而，可悲的是，我在互联网上浏览，设法传递自己的观念时，却发现对于残忍怯懦的权贵阶层而言，真相一文不值——他们潜伏在幕后，藏身于深林；而这片丛林，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

我们对媒体网络依赖至深，因为在为正义而战之时，我们想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同行之人；我们需要就重大问题沟通交流，需要共同商策如何令未来更加美好。而媒体网络早已被唯利是图的短视之徒收买。

搜索引擎谷歌根本就是跨国企业 Alphabet 用于榨取利润的无情工具；该公司完全不受监管，谷歌也在大搞信息垄断。奇怪的是，我的朋友们似乎都对此毫无察觉。同时，他们也许是对真相茫无所知，也许是拒绝承认：操控地球公民之间话语的脸书、推特等私人企业，其宗旨便是管控民众，其本质恶贯满盈。

我们从心底里希望把它们看做互联网服务业的客户或者所有方；它们也在不遗余力地举行各种公关活动，让我们相信谷歌和脸书同慈善设施和责任感极高的政府机构一般无二，完全是为了让民众以科学方法追求真理而诞生的。

当然，这些企业并不会阻止我们为促进政府改革、建立健康社会而努力，但前提是我们的活动不会损害到它们及其客户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它们的主要职能常常是将你我切实改变国家的要求转变为对无能乃至卑劣的政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类似底层生物的不满。

它们，以及它们所创办的慈善机构貌似慷慨正直，却通过分散诸位以及诸位亲友的注意力，令诸位无法开展有条理、有效率的思考，利用帖文和短消息让诸位沉溺于即时满足而渔利。它们避重就轻，拿美国的小问题大书特书，把相关报道灌输给我们，令全国无法上下一心，共同面对当前真正的道德与政治危机。

它们说诸位是谷歌、脸书、推特、色拉布等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的用户，然而实际上我们是它们销售给他方的商品：我们的履历、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朋友和联系人等私人信息都是它们贩卖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为劫掠你我和美国的企业提供服务，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误导我们。它们提供给权贵阶层的最为珍贵的商品，便是受过蛊惑、不知真相为何物、不知可信者为何人的大众。

此次新冠疫情也被它们拿来大做文章，围绕着疫情而生的焦虑与困惑正是它们要贩售给第三方的商品。它们将前后矛盾的讯息展示在诸位面前，完全无意探寻科学真相。

那么，媒体和社交网络向不同群体灌输相应迷惑性信息的目的何在？

它们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令民众对全部机构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媒体、腐败官员和卑鄙专家教导民众，新闻、政府、警方、大学、研究机构和权威人士均不值得信赖。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没有任何一方尚能阻止权贵阶层巩固自己的实力。谷歌、脸书、推特之流把自己扮作致力于发掘科学真理的可靠机构，煽风点火，在这一恐怖过程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该过程的环节之一，便是建立彻底腐败的政府和各种机构。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报道也并非完全失实。

破坏所有公共机构与开展独立、客观分析所需的资源是强力推行政府、教育与民众交流渠道私有化的必要一步。

我们与他人的交流渠道也是上述企业打算控制的政治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生产食物的方式、居住的地点以及购物的选择早已在它们的掌控之中，然而倘若我们的互动渠道也沦为它们的资产，倘若我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购买与亲友沟通、建立组织、保卫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简直与奴隶别无二致。倘若我们不通过它们便无法与人见面，无法出门旅行，无法通信、发电邮、打电话，那么它们便不仅能够监控我们的一举一动，更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切断我们与外界的交流。

脸书共和国

我想花上几分钟讲讲脸书这一社交平台——“脸书”公司称该平台归其所有，并用之以操控、误导民众。这里我并不是说脸书之无耻绝无仅有，也无意于贬斥其为最最差劲的公司，之所以用它来举例，是因为我有与它打交道的经历，而且我觉得它大有潜力：只要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它完全可以推动美国大步前进。

脸书已经通过向全世界推销谎言为其所有人与投资商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它看似一个共享、透明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可以促进民众的交流合作，却没有赋予其用户决定其运营方式的权利；它向民众发布旨在操控他们的讯息，同时又通过售卖收集而来的用户信息来牟利。除了计算进账多少的超级计算机，它不对任何一方负责。

可是，脸书比其任何一家竞争对手都要“平易近人”得多。这是因为脸书公司可以获得大笔大笔的低息贷款，并用之以占领全球市场。

与此同时，脸书已经变成了可供全世界用户寻找志同道合之人、进行国际交流的强大平台。人们可以在上面分享萌宠与咖啡图片，也可以用它来开展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商策如何令世界更加美好。不过现在，脸书更希望诸位只顾欣赏眼前的浮光掠影。

在脸书上找到与我们意气相投、或是身处同地的人并非易事；而且通过脸书接受、发送的资料不可分门别类地储存于该平台，

供日后查阅。稍加时日，我们在脸上发布的信息便变成了脸书公司及其客户的专属之物。第三方开发的原创应用无法在脸上运行，因此用户也无法拓展该平台的功能、随意定制自己的首页。

尽管如此，即使其当前版式相当粗糙，但脸书仍然具有组织全世界的深谋远虑之人开展广泛对话的潜力。这一平台功能有限，对意欲寻求真相的用户又不甚友好，可是仍然有思想深刻的活跃用户汇聚于此，其中不乏初高中的学生。

也就是说，脸书为完全隔绝于政治讨论的民众提供了团结一致，共同为当地社群、为整个世界贡献力量的机会——尽管它的设计初衷或许并非如此。

倘若拿脸书——一家营利性企业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国际性组织相比，我们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前者的参与允许度要远高于后者，其环境更适合民众进行广泛讨论。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举办的是内部讨论，讨论结果会被编写为晦涩难懂的长篇大论，或者单方面展示给读者，或者通过主流媒体播出。至于这些组织所拟定的政策之优劣，如你我，如尼日利亚的街头商贩和中国高中生一般的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置评——尽管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

联合国只承认民族国家为其会员国。然而目前大多数民族国家的体制都因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国内阶级分化而四分五裂，因此普通民众根本没有通过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建言的机会。

可是，如果让脸书转型成为归世界公民所有、运营的全球性机构，那么它便可以在真正的全球治理大业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请记住，成就脸书这一社交平台的，并非脸书公司，而是我们用户。同样，推特、色拉布等某些企业自称归其所有的平台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就，也要归功于我们。是我们发布了五花八门的内容，令脸书生气勃勃，是我们织就了高效广阔的关系网络。

拥有脸书所有权的企业其实同十九世纪铺设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强盗大亨一般无二。克拉克·杜兰特与马克·霍普金斯等人从银行融资，为牟取暴利修建了联合太平洋铁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民众的努力，该铁路网被纳入了规管框架之内。《1887年州际商业法》规定禁止歧视短途旅客、采取掠夺性手段，此后一条条无人监管的铁路受到了相关法规的严格管制。

邮政也是从营利性企业手中的、杂乱无章的谋利工具转变为提供重要服务的非营利性政府部门的。如今各大企业财团正在为将邮政服务私有化而煞费苦心，然而政客们懦弱无能，居然没有人敢提出反对：不仅邮政服务不应私有化，而且谷歌、脸书、亚马逊也应转型为受政府监管的垄断企业或者归用户所有的公司。

可悲的是，尽管我们身为纽约公民与世界公民，尽管我们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的商品分销、物流以及数据发布与收集系统，但我们仍然对彼此一无所知。我们必须克服对彼此的无知与冷漠，建立全新的参与性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全球危机。

脸书可以成为团结你我的纽带，但我们必须提出强势的诉求。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权拥有脸书的是我们，而不是一家从我们身上吸血的公司。我们应当提出切实的提议，为脸书规划发展道路，将脸书公司和与之类似的企业引上正途。

现在，直接游说脸书，让其改变管理规则，允许用户通过民主过程决定脸书平台的设计与框架，以此来建立真正的共享型全球线上社区绝无可能，因为如此唯利是图的企业根本没有接受我们请求的动机。

另一方面，其他社交网络的参与者又相当有限，因为它们缺少民间资本来源，同时还要遭受跨国企业的挤兑。

我们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决定脸书应当如何进行内部管理，个人用户应当如何讨论脸书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怎样才可获得通过、在地方及世界范围内施行。

首先要对脸书进行改革，使其更面向大众、更加透明，更能迎合个人与不同群体的需要。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诉求开始，比如

允许个人用户在平台上自行设计应用，让用户有权利买卖自主开发的应用等。

这一过程还可包括通过选举建立地方社群，以讨论、决定当地乃至全球的脸书运营政策。

所有权问题

要让脸书成为由我们控制的集团，我们必须坚决主张脸书平台的内容以及生自该平台的利润归我们所有。也就是说，脸书理应属于我们。

脸书股份有限公司称脸书平台产生的利润归其所有，对上传内容、织成关系网的用户一毛不拔，这种做法大有问题。应当拥有脸书的，显然不是能够进行国际融资、请得起大群律师的富豪，而是其创造者。

我们需要开展切实讨论，商谈脸书的归属问题，同时制定提案，规划这一供民众交流的共享空间在未来应当以何种形式归何人所有。这些提案必须以民众的具体诉求为基础，令共享所有权、共享利润等规划能够由专门的用户群体贯彻实施。

要让脸书归我们所有，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担当何种角色，摆脱深陷多年的消费迷梦。我相信，当前的经济、生态与意识形态危机足以令大家清醒。

我们还可以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脸书宪法基本草案，建立脸书、类似社交网络平台以及搜索引擎的全球管理框架。

这部宪法将：

1. 创立相应机制，令脸书能够响应公民的需求；
2. 令脸书遵守一系列道德原则；
3. 保证脸书的金融交易情况和管理架构完全透明，其所有利润由创造内容的用户共享；
4. 确保政策的制定过程绝不会受到私人资本的干涉。

届时电脑编程、设计、法律、艺术、哲学、文学、工程、社会学、物理、生物和信息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将参与此次大会，打造脸书宪法的基本框架。

会后应有六个月的商讨期：我们将与整个脸书用户群体沟通交流，在此基础上修改工作组的初步提案，努力同大家达成共识。随后，在宪法得以通过的那天，脸书的全部用户都将变为它的公民，就建立高度负责、管理体系高度透明的“脸书共和国”一事投票。

在我的领导之下，我们将创建一个微支付系统，令脸书共和国的利润在其用户，在其创造者之间公平分配。届时脸书公民可以自由交易、交换作品，并可通过发布帖文、设计、表情包、视频和音频来获取适当收入。脸书股份有限公司将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许可以将其改造成为类似于 Merit Network 的承包方——后者曾承包早期互联网的运营管理工作。

以德为本的脸书平台将成为全世界同心同德的人相聚的空间，让他们为创建全球参与性民主制度而努力，组建团队，启动合作项目，就人类共同的问题制定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通过脸书来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伙伴与合作者，开展研究和政策讨论，将想法付诸实践。在资金来源十分有限的时期，让相似群体能够共享钱财，意义不可估量。

倘若我们有此意愿，倘若我们面对当前的全球性危机觉得自己责无旁贷，那么脸书平台即可转变成为践行全球民主治理的合法渠道。整个互联网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等网络变为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的宪政民主世界。

2020 年 6 月 19 日

拆除隔离区！

——为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而作

整整七十年前，朝鲜人民志愿军大举南下，对朝鲜半岛南部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朝鲜人民看来，把“侵略”一词换为“解放”或许更为妥当。韩朝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后果，是美苏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斗争的遗祸。当时曾经有力推动反法西斯斗争的旧有国际治理体系已淡出历史舞台，美国与苏联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当建立全新全球治理框架，进而针锋相对。两国也曾为反抗法西斯势力而结为盟友；冷血残酷的法西斯分子为逞私欲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屠杀，他们奉行纳粹种族主义，认为许多人种根本不配拥有权利，哪怕是生存的权利。

朝鲜对韩国的入侵并非两国冲突的起点，却改变了两国冲突的性质。要让美国拥有光明的未来，要让美国继续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正视、了解七十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至关重要。

美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何种角色，以及它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一个为成为亚洲问题专家而钻研多年，致力于了解亚洲、为亚洲的明天做出切实贡献的美国人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美国人以及美国的机构组织为改善朝鲜半岛人民生活而努力付出的事例历历在目，但美国仍有许多不甚友好的活动让人无法释怀。

美国正走在极端孤立主义的回头路上，其主流媒体充斥着种族主义话语与反亚洲言论。非但如此，美国还屡次将对韩销售武器作为向该国履行承诺的前提条件，且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与朝鲜威胁论。因此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其所有的义举都会被反美浪潮所淹没，而且许多人对美国的反感并非毫无道理。目前巨浪的潮头已经袭来。

然而我们绝不可以靠高举美国大旗、强词夺理来应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在东亚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更将在世界范围内一筹莫展。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谴责美国极具种族主义色彩和破坏性的举动，指斥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腐败和堕落，同时以全新视角展望美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应当发挥的作用，彻底摒除煽动冲突、竞争、霸凌与消费的危险痼疾。我们可以，也必须以合作、共存、气候科学和文化交流为基石，构想未来。

让我们回顾一下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人民志愿军经开城向首尔进发、经春川攻至洪川、经江陵开往浦项的时刻。整个朝鲜半岛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变；家人无法团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这场历史上平民死亡率最高的战争中丧生；一切都无法回归正常。此刻，在等待生活恢复如常，等待能像以往一样工作、出行之时，我总会不禁联想到七十年前朝鲜半岛所经历的可怕变故。

朝韩两国的龃龉摩擦由来已久。1948 年 4 月 3 日，在济州岛民众为反对李承晚政府而举行的抗争中，数万人失去了生命。该事件无异于一场战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平壤的基督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对抗也导致了灾难性的悲惨后果。朝韩冲突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而这样的斗争也曾在中国、越南甚至日本以更为公开的方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

其实早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之前，亚洲地区政治文化斗争的本质便已开始发生变化。1948 年中国经济的崩盘与国民党的溃败导致了其政治格局的转型。1949 年 10 月 3 日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之后，美国在国内党派的推动下同反法西斯盟友苏联渐行渐远，也不再刻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美国亲商团体上下奔走，想促使美国与大英帝国建立紧密联系，接过原本以英国为主导、当时业已衰败的全球体系，借此攫取权力与经济利益。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人种优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埋葬在愤世嫉俗的、以“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为主要论调的运动当中。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消除各种政治、经济方面复杂的可能

性，让美国成为全球反共活动的基地。最后华盛顿做出了悲剧性的选择。

做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未能充分认识其弘扬国际主义的神圣使命；招致险恶、另类的全球主义的大门由此而开，美国也因此陷入了危险的境地。非但如此。由金九领导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亚洲其他韩国团体所提出的建立一个文化开明、政治开放、不受殖民主义枷锁束缚、独立统一的韩国的梦想也被搁置一旁。美国寻求理性、合作的声音均被压制所谓政治“左翼”言论的运动扼杀殆尽。

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以荡清美国国内为追求和平而力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有识之士为己任。当时最骇人听闻的，便是当局对优秀汉学家欧文·拉蒂摩尔的迫害；而拉蒂摩尔有此遭遇，只因为他在努力调查真相。这场运动令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化作泡影，也永久改变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曾由许多美国仁人志士大力支持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被彻底葬送。

如今，七十年后，我们又身处何种境遇？美国仍在韩国驻扎有多支军队，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华盛顿与首尔的政治机构都认为，美国军队必须常驻韩国。至于驻韩美军何时回国，朝鲜半岛何时统一，根本无人构想。

关于美国在海外驻军长达七十年一事，美国宪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韩国掏出大笔资金，否则美国将撤回驻韩军队——说这番话时，他代表的是想对韩国人进一步压榨盘剥的、愤世嫉俗的利益集团，然而一个深刻的真相也呼之欲出：美国绝不该在韩国驻扎军队；军事联盟关系需要以战争状态来维系，不可依靠它来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真正主旨，应当是增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以及增进对当前时代真正危机及其应对之法的了解。

今天，做为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我想就美韩邦交提出愿景，展望两国关系从今时今日，从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纪念日一起将达到何种深度。

我们将鼓励韩美两国民众竭诚合作，共同面对二十一世纪真正的安全挑战。朝鲜开发核武这一问题并非我们要解决的当务之急；除非美国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各项原则，制定计划，迅速销毁境内尚存的所有危险核武，否则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阴云将永无散去之日。

美国人民在朝鲜半岛上的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于韩国民众。事实上，美国人应当同所有智勇双全、热爱和平的人士合作，为朝鲜半岛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论他们是在韩国、朝鲜、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在美国。

安全保障将是此项事业的关键一环，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安全”一词。

在天启四骑士现身之际，世界各国都必须予以应对，重视安保问题。应对之策应当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殊途同归，而不能使 50 年代朝鲜半岛分裂的悲剧重演。这种可悲的分裂状态必须立即终止，韩朝必须马上破镜重圆，就在今天！

那么，我所说的“天启四骑士”究竟是何身份？鉴于当下种种，“天启”一词绝非夸张之语，也不再归原教旨主义者所专属。“哈利路亚，我相信！”

第一名骑士是气候环境的崩溃、海洋的衰亡、沙漠的蔓延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的残酷破坏——邀请它降世的，是人类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

第二名骑士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巨量财富迅速流向少数富豪手中，而他们此刻正在谋划通过超级计算机网络来彻底控制金融系统与货币，为牟取利益、为取乐而创造无需人工的经济体系。

第三名天启骑士是技术的更新换代。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成为了消极被动的动物，失去了所有能动能力，无法开展有意义

的政治活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及令这一退化过程更为迅速，而其背后的目的是让少数人进一步获利，同时通过宣扬消费文化来愚化民众。

第四名骑士是国民经济的极端军事化。这一过程一般会避开民众的视线，但不加节制的全球性军备竞赛已经因其而在陆地、海洋、甚至太空领域开启，很可能会招致全人类的末日。

众多危机愈演愈烈，全世界都必须予以关注，设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可以持续的未来——这也是美、朝、韩开展合作的中心原则。更直白地讲，倘若同韩朝的某项合作无法迅速、切实地解决上述问题，或者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直接关联，那么这项合作就应当终止。我们没有多余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来从事与拯救人类这一首要使命无关的事情。

最后，朝鲜半岛的统一会为我们带来五百年一遇的重大机遇，让当地民众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奠定下基础。这个国家不仅会让其百姓欢欣鼓舞，更能给全体地球公民以崭新的希望。

韩朝民众可以大规模建立全新体制——这一点其他国家无法轻易做到，因为朝鲜半岛正在经历全面转型。他们可以叫停矿物燃料的使用，创造以民为本，而非以国际投资银行为本的金融系统，诚实、勇敢地践行国际主义，与他国人民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朝鲜人民节俭低调的生活并非一定要被盲目消费或草率的经济发展所代替。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彻底摆脱矿物燃料的国家，完全有底气不去开采埋藏在森林与土地下方的矿物与煤炭，避免它们被跨国企业染指——人和生态环境远远比金钱珍贵。

这种重视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以及道德哲学的传统在朝鲜半岛拥有悠久的历史。我曾偶然了解过韩语中的“弘益”（广泛施善，让社会大众受益）、“书生”（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优秀学者）等概念。这些理念将帮助韩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

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根本无法通过投资银行或者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

美国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身在美国、热爱和平与自由、反对极权主义、有志阻止我们的生态环境毁于一旦的人们，必须像我们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做过的那样，与世界人民一起群策群力、风雨同舟。我们即将面对一场苦战，但这场战斗能够鼓舞人心，以追求真理为宗旨，以科学的政策方针为基石，可以让美国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重新焕发光辉——自那段黑暗时期以来，它已经被尘封得太久太久。

这就意味着拆除隔离区，意味着向立志解决真正安全问题的人们伸出手去，意味着为朝鲜半岛，为东北亚，为世界开启全新的未来。

唐纳德·特朗普的花言巧语，尤其是他那句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我无法苟同。然而我可以说，在全体韩朝民众、东北亚人民以及宝贵地球所有居民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通力合作，为灰心失意、深受压迫的人们带去希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迈出让美国走上复兴之路的第一步。

2020 年 6 月 24 日作于临津阁

